

《记忆》137期
教育专辑（六）

目录

【专稿】

余敏玲 苏联新人保尔·柯察金与典型中国化

【“狼奶”讨论】

马昌海 唯物史观献疑（二）——五、阶级与国家理论问题

六、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关系问题

七、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八、历史创造者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朱 特 狼、“狼奶”及其它

【评论】

潘祛病 “红色读物”解读——“高玉宝现象”简论（一）

【述往】

胡双宝 关于高考录取的回忆片段

唐振权 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的“教育”

【文摘】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北京市文艺界学习运动进入思想检查阶段

山东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思想改造学习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委会举行自我改造学习动员大会

【资料】

《解放》、《肯登攀》、《众志成城》、《放眼量》 大事记编写小组

北师大女附中 17 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

北师大女附中《劳动》第二期（1960年11月30日）

【编读往来】

1. 孙柏青、吴越谈王海光《答客问》，批评本刊违背首发之约

2. 《记忆》答孙柏青、吴越二位先生

3. 陈小穆谈王海光《答客问》

4. 予庆谈江青研究

5. 陈闯创谈 134 期

【版权声明】

【专稿】

苏联新人保尔·柯察金与典型中国化

余敏玲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①

文学向来是共产党最重视的宣传媒介之一，斯大林称作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又以小说的篇幅和表述手法最能完整开展情节与呈现作者理念。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承认小说的主要功能是娱乐和寓意，直到晚清若干知识分子方赋予小说政治使命；最有名的例子是梁启超的新小说观。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为何小说有如此的重要性？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支配人心的力量。小说常常引导人们悠游于作家笔下的境界，感人至深，进而改变读者对平常所熟悉的世界的认知。读者会不知不觉进入小说的情境，并且常将自己化身为书中人物，进入书中的角色。因此梁启超主张“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

本章之所以选择翻译小说，而非本土小说，乃因中共关于新人的最重要观念与典型均来自苏联，苏联小说中出现的新人典型比中国小说要早得多。众多的苏联翻译小说中，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К а к з а к а л я л а с ь с т а

^①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第1版，1995 第5版），页278。

^② 原文发表于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第1号，转引自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入氏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集2，页758-760。

Ль)在中国流传最广最久,其主人翁所代表的新人典型较为完整,因此本章的讨论将以这本小说作为焦点。

毛泽东时代曾经有无数中国人将前揭那段名言,或写在日记,或挂在床前,或贴在墙上,或放在案头,或背诵在心,当作人生座右铭,用来鞭策自己,勉励自己。尼可拉·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Alekseevich Ostrovskii, 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经陪伴数代中国人走过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深深地影响过他们的人生观。本章以这部小说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Pavel Korchakin)①为例,阐述新人典型应该具有的各种特质,其内容也随着政治气候而变化;同时因应需要而产生中国的保尔典型。中共赋予保尔精神政治使命,不但用以作为改造人民的标准,而且在中苏交恶之后,转为中共争取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同时,本章也将陈述中共如何利用各种媒介来宣传保尔精神。

一、保尔的诞生与传入中国

根据流传最广的传记版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04年9月29日出生在乌克兰一个酒厂工人家庭,后来定居在谢比托夫卡(Шепетовка)镇。他因同情红军,加入内战,1919年加入共青团。数次战斗使他的腹部和头部受了重伤,并在16岁时瞎了右眼。后来又因为卖力参与修筑从基辅到波雅尔卡(Боярка)的铁路,得了伤寒与风湿病。1924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并回到故乡谢比托夫卡镇担任党的区委委员。但他的身体状况

急剧恶化,终于导致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由于不愿成为只领政府抚卹金的残废,原本教育程度有限的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Свердлова)函授学习。奥氏最后将自己在内战时期的经历与听闻写成小说,用笔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②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他撰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为了响应苏联共青团

① 按俄文的音译,应该是帕维尔·科尔恰金。俄文名字 Pavel 即英文的 Paul。现在人们熟知的保尔·柯察金译名,乃是从英译本而来。

② Семен А. Трегуб,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 (1904-1936) (尼古拉·雅列克塞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0).

中央号召作家创造当代革命者的形象，写出自己亲眼所见，亲身参与内战的一些事件，给无缘目睹父辈为国英勇奋斗的青年读者。①1928年他开始动笔写作，可惜唯一手稿因邮寄而遗失。他虽然一度感到气馁，最后仍振作精神，重新提笔，完成小说。最初没有任何文学杂志愿意刊登，理由是人物欠缺说服力，文笔欠佳。后来经过一位与文学界关系良好的老党员辛苦奔走，极力为小说请命，终于获得共青团机关刊物《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编辑 TarasKostrov（1901-1930）的首肯。编辑们历经四年的修改，小说的第一部分终于在1932年春天《青年近卫军》第四期开始连载，第二部分则于1934年上半年问世，并于当年集结成书出版。②刚开始这本小说并未受到重视，直到1935年3月17日，他的事迹第一次刊载在《真理报》“我们国家的人民”栏目，以〈英勇〉（Мужество）为题，方才一夕成名。③不久，红军组织读书小组，研读这本小说，并且认购了该书第一版百分之八十的数量。④各地组织机构，特别是党小组，纷纷起而效尤，都被要求认真研读、讨论此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顿时风行苏联全国。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的前两年间，这本小说用苏联各种民族语言重印再版了50次。⑤直到1980年代晚期，这本小说仍是每位苏联学生必读作品。⑥

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着，梅益等译，〈我怎样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创作过程——在联共（布）索契市委常委会上的发言〉，《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1版，1995年第2版），卷2，页735、748。

② 除了文字的润饰，在情节方面，特别是与政治有关者修改更多。例如，编辑删除第一部分最后一章保尔参加工人反对派的叙述；删除保尔为了冬妮娅迷人的眼睛而跳崖一幕。第二部分更动最多，有关党内与托洛斯基派的口舌交锋部分几乎全部被删。集结出书时，书的编辑比杂志的编辑对政治更敏感，书的内容与在杂志连载期间并不完全相同。Елена Толстая-Стегал, “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фону книги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文学背景)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etique 22:4 (Oct.-Dec. 1981), pp. 381, 383, 385, 389-392. 苏联于1989年出版3卷本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详细列出小说中被编辑删去的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0年重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全部译出这些删节部分。见页448-490。

③ Михаил Кольцов, “Мужество” (英勇), Правда (真理报), 17 марта 1935 г. (1935年3月17日), с.4. 这篇报导乃是1934年底，记者兼作家米·科利佐夫在黑海之滨的索契市(Сочи)访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成果。

④ 奥斯特洛夫斯基着，〈给父亲和哥哥的信〉，《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卷2，页887。

⑤ 9 Лев А. Аннинский,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Николая Островского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8, 第三版), с.7; 黄树南, 〈译者前言〉, 收入奥斯特洛夫斯基着, 黄树南等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4), 页2-3; Елена Толстая-Стегал, “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фону книги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с.383. 该书在苏联被翻译成42种语言(116种版本), 在国外有18种译本(26种版本)。克士译, 〈尼可莱·奥斯特洛夫斯基〉, 《新华月报》, 卷1期1(1949年11月15日), 页297-298。

⑥ 10 David Gillespie,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Novel: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D.C.: Berg Publishers, 1996), p. 6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叙述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如何从一位原本缺乏政治意识的少年，历经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以及数位老共产党员的启蒙与教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以献身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作为一生的志业。他所成长的乌克兰小镇谢比托夫卡（即奥氏故乡），是六条铁路交会的枢纽，又离波兰边境不远，乃是兵家必争之地，也为故事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从一次大战到苏俄内战，这个地方先后被德军、红军、白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波兰军队占领过，最后是红军获胜。故事始于保尔因故得罪了学校的神甫而被开除。在税吏家帮佣的母亲便将年仅12岁的儿子，送到该城的火车站炊房，担任烧水工作。那里的工作环境让他看到了有权势的人如何压迫下层劳动阶级，这也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在偶然的机，保尔从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党员水兵朱赫来那里得知布尔什维克党专为解放被压迫人民的说法，十分赞同。从此他开始暗地支持红军，并参加战斗，后来加入共青团，并参与修筑铁路的艰困工作。在这些过程中，保尔因为受重伤，变成残废，最后瘫痪。但是他不愿成为只领国家抚卹金的废人，积极寻思继续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其他方式。故事以他决定用笔写出自己一生经历，用笔重新加入革命行列，作为结尾。奥斯特洛夫斯基将书名取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味着革命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如炼钢一般，经过高温大火与急剧冷却的锻鍊而成。编辑原觉得这样的书名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与真正的冶金炼钢事业有关，但他坚持用这个书名。他认为КЗС这三个字母（俄文书名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缩写），对青年而言，如同引航的灯塔一般。^①

这本小说突然受到苏联当局的重视，与1930年代的政治大环境关系密切。十月革命之后，党的高层领导都有机器崇拜的倾向；他们认为机器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1920年代有不少小说描述机械的伟大，个人只是国家这个大机器中的小零件，微不足道。1931年7月，斯大林的讲话强调专家的价值，官方的宣传也因而逐渐地强调专家、人才的重要性。国家建设需要重视好的领导和好的管理人才，俾能让苏联的工业化有更好的发展。在此同时，文学界也被要求配合这些变化而创作，他们放弃了过去崇拜机器的题材，转而改写可以引为模范的人物。人不再是一个机器的部分零件或螺丝钉，即使是资产阶级出

^① 《新闻纪事报》驻莫斯科记者询问奥氏，为何选择这样的书名？奥氏答道：钢铁的坚硬是在烈火和急剧冷却下锻鍊而来的。他们那一代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与考验中锻鍊出来的。（对外国朋友们讲的话），《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卷2，页771；Елена Толстая-Стегал，“К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фону книги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с.376.

身者也有潜力通过在工厂或劳改营的劳动，而被整合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有关当局期望作家塑造“大写的人”，描述一个平凡百姓、一个“小人物”如何透过自己的努力和适当的政治指引，成为“大写的人”、“突出的个人”的过程，成为一般群众可以效法的典型。党的领袖是“父亲”，“小人物”经过“父亲”的指导，成为“大人”、“突出的个人”。他们依赖党的领导，靠着布尔什维克般的意志，牺牲奉献于社会大我。无论是真实世界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或小说中的保尔，都符合这样的诉求。他们皆出身于社会底层，在政治意识上一步步的成长与进步的过程，正好是当时官方所欲宣传的政治文化典型。这本小说也回应了当时提倡文艺要反映时代的呼声。^①

文学评论家 Lev A. Anninskii (1934-) 即指出保尔是奥氏那一代人的象征，他与当时的历史事件密不可分。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这本小说中表明了“在十月革命里，在反资反帝的内战斗中，‘怎样产生了和巩固了工人与贫农的阶级意识，怎样产生了工农英雄。’”^② 保尔钢铁般的意志是从战争、艰苦的环境磨练出来。虽然奥斯特洛夫斯基特别强调这本小说不是他的自传，只有部分内容是他个人的经历，主要还是以他所听闻或目睹的真实故事为原型或情节。^③ 不过，在官方的宣传中，作家个人的生活与小说中人物的经历有很大的重叠部分，暗含小说接近真人真事，而有鼓舞一般人的作用。1935年10月，奥斯特洛夫斯基荣获列宁勋章，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章的苏联作家。当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葛·彼得洛夫斯基(Grigorii Ivanovich Petrovskii, 1878-1958) 为他的书作序时，特别指出这本书对苏联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保尔为了将整个身心献给社会主义斗争，最后放弃了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小姐的感情。现代青年可从本书”汲取不少生活经验，以避免错误，对抗堕落，肃清旧生活的渣滓，而重新革命地建设起新的家庭。”不论是血战中所受的重伤，或是威胁他生命的重病，保尔都没有因此受挫，仍然勇敢坚忍地为建设国家，为反对一切错误的政治倾向——为党的列宁总路线而斗争。保尔的形象是教导后代应该如何生活与工作的

^① 12 Katerina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nd edition), pp. 117-119, 130-132.

^② 13 Лев А. Аннинский,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Николая Островского, с. 93.

^③ 奥斯特洛夫斯基, 〈对国外朋友们讲的话〉,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两卷集》, 卷2, 页758.

模范。① 苏联文学教科书的标准本更进一步指出，奥斯特洛夫斯基将保尔·柯察金的一生与带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奥氏打开人类潜存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证明了献身于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会产生出一种升华、真正的道德，更丰富了人的精神层面。② 这就是新苏联人，不但生活、生命有崇高的目标，而且有坚强的意志和行动力去完成这个目标。

1940年，苏共当局在莫斯科成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馆内陈列了奥氏生前的用品和著作。1942年，苏共为激励人民抵抗德军侵略的爱国情绪，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拍成电影，广为宣传保尔精神。二次大战期间，苏联人民常常会在受伤或阵亡战士的大衣里找到这本弹痕累累的小说。③ 这些被飞机大炮所射穿的书本，迄今尚保存在博物馆。一些苏联最勇敢的军队，往往都用保尔·柯察金来命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萧洛霍夫曾说过，这本书已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生活教科书。④ 而这部小说也是在中国战云密布的时候，被翻译成中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现在中国的最早版本，是由段洛夫、陈非璜根据1936年出版的日译本转译而来，上海潮锋出版社于1937年5月出版。但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版本则是梅益的译本。⑤ 根据译者梅益的回忆，1938年4月，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交给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译本，⑥ 明言党组织认为这部作品对中国读者很有教育意义，希望梅益能以作为组织交办的任务，尽快译完。梅益因编报与妻小重病，至1941年冬撤离上海前夕才完成翻译。1942年夏天由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并送到大后方和根据地。⑦

① 葛·彼得洛夫斯基，〈序〉，收入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香港：三联书店，1972），页10-11。

② David Gillespie,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Novel: An Introduction*, p. 62.

③ 列·费·叶尔绍夫着，北京师范大学苏联研究所译，《苏联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页230。

④ 季莫菲耶夫主编，殷涵译，《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简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转引自邹振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教科书〉，收入氏着《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页411。

⑤ 在1942年初版5,000册，销路很好，同年5月上海远方书店再版，以后大连中苏友好协会、解放区的新华书店亦纷纷再版，甚至还有梅益译本的改编本与通俗本。邹振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与影响最大的译本〉，收入氏着《译林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页200。

⑥ 这本英译本的译者是阿历斯·布朗(Alec Brown)，书名叫做 *The Making of a Hero*，而不是后来照俄文书名翻译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1937年纽约出版。

⑦ 梅益，〈重版后记〉，收入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着，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527；译文曾由姜椿芳根据俄文加以校阅增补。梅益，〈深情的怀念〉，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下册，页66。

译本出版之后，马上在延安整风中轧上一脚。中共当局号召要“学习保尔·柯察金的优秀质量”，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程度，锻炼党性。曾有中央党校女学员提到，资产阶级教育使她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不感兴趣，而必须自我检讨。^①国共内战时期，中共考虑读者以青年与干部为主，他们正忙于战斗和工作，没有时间阅读长达30万字的原著，因此出版了缩写本；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本书曾给许多青年无比热情与勇气而走上革命道路，且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更坚定的意志”。^②中共显然期望这本书能促使青年认同共产革命，并勇敢、坚毅地接受随之而来的严峻挑战。中共建国初期，掀起巨大的译介苏联文学的洪流，是继五四以来另一个翻译俄国文学的高峰。除了重印1930年代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更翻译许多新的作品。当时中国所翻译的俄文书籍之多，有如过江之鲫。根据中共出版总署不完全的统计，自1949年2月到1952年9月止，大陆出版的苏联书籍中译本共约3,131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就有12,166,100多册，其中列宁、斯大林著作占六分之一。^③直到1953年年底，所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即有79种获得斯大林奖。《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亚力山大·马特洛索夫》、《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日日夜夜》、《不屈的人们》、《绞刑架下的报告》、《丹孀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等都是当时的畅销书；而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发行量最大。^④根据中共出版界的统计，中共建国之后销售量最大的文艺小说，有杨沫的《青春之歌》等17部，其中唯一的译作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销售累计达207万册。^⑤195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1942年的梅益版本加以校订修补后，第一版(1952-1966)发行一百多万册；第二版。^⑥有关当局考虑到不同程度的读者与儿童，还推出各种缩写本与漫画本。^⑦值得一提的是，这

^①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页176；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0），页432。

^② 白刃缩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缩写本）（天津：知识书店，1949初版）。

^③ 新华社，〈中苏两国三年来文化交流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12月9日，第3版。

^④ 〈我国大量出版苏联文学书籍中文译本〉，上海《文汇报》，1953年11月20日，第3版。

^⑤ 26 邹振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教科书〉，收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页409-4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工作报告（1949年10月8日）〉，收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卷1（1949），页376、633。至第四版（1979-1995）发行一百三十多万册；总共印刷了57次，计有二百五十余万册。

^⑥ 梅益，〈译后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版），页493。

^⑦ 28 例如，中耀改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新华书局，1950，缩写本）；彭达林科改编成戏剧，

本在大陆十分风行的小说，也曾经悄然登陆台湾。只是在1950年代的台湾，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环境使然，这本在大陆被中共力捧的红书，到了台湾却变成禁书。国民党当局不但不鼓励人民阅读，反而会因为阅读该书而惹祸上身。当时曾有12名台湾青年以叛乱罪名被军方起诉，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向人宣讲“匪”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军事检察官所举证的“事实”之一是：他们“于民国四十二年十月一日匪帮『国庆节』举行加菜及互相检讨批评暨研究匪党理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志克服环境》等问题。”^①

二、保尔精神特质与在中国的宣传

保尔一生的最高目标，乃是为党、为革命事业献身；其他一切都臣服在这个目标之下。左右他思想的两大原则分别是阶级观念与集体意识。保尔的一切作为都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现分述于下：

(1) 党与革命事业：这是保尔生命意义之所在。保尔一生奋斗目的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解放被压迫者，为了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事业；这些是支撑他一生，激发他努力不懈的终极理想。他的集体意识就是以党的意志来体现。保尔每天在狂热的激战与建设中，使他融化在集体里，完全忘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的眼中，只有党的“大我”，没有个人的“小我”；只有集体意识，没有个人意识。由于打仗受伤、修路受寒，导致保尔的健康严重受损，终成残废。后来他也承认自己过去对健康的糟蹋是不对的，因为受到损失不是他自己，而是党。如此一来，他就无法为党及革命事业做更多的事。他奋不顾身、忍耐疼痛地与敌人作战，罔顾恶劣的工作环境与天寒地冻，依然积极努力，都是以完成党交付的任务为最大考量。即使他受尽病痛之苦，也从不诉苦，因为个人的事情完全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当他在海边回顾他二十四年来的岁月，曾经犹豫是否要一枪毁掉那个背叛了他的肉体，继而觉得这是种懦弱的作法。最后他以“即使生活到了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作为结论。他认为生活中，再没有比离开革命队伍更令人恐惧。只要他的

陆立之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海：北新书局，1951年1月初版，3月再版）；吴昭江、李晴改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开明书店，1952）；潘安荣注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959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首次出版连环画，共四百多幅画。王素、夏星改编，毅进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①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判决：（(43)审三字第52号），1954，感谢施显华先生提供资料。

心脏还在跳动，就不能叫他离开党；能使他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即使全身瘫痪在床，他也要用笔将过去参与骑兵师的故事写成小说，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掉队。^①

(2) 爱情：保尔对爱情的解释是资产阶级的爱情只重视肉体 and 物质关系。真正的爱情只能产生于无产阶级，更多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或以友情代替爱情。工人出身的保尔无意间爱上了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他们虽然有个浪漫美丽的开始，最终注定要分道扬镳，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他们的感情第一次出现严重裂痕，是在保尔带冬妮娅出席城里的共青团全体大会。一身漂亮打扮的冬妮娅，置身于一群衣衫褴褛的共青团员中，不但十分显眼，而且格格不入。冬妮娅漂亮的衣服对无产阶级而言，是“卑鄙的个人主义”。保尔当时既为难又生气；他多么希望冬妮娅能摆脱资产阶级的一切束缚，跟他一起加入革命行列。然而，冬妮娅虽然有勇气爱上一名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保尔只有选择分手一途。在他们的分手谈话中，他对冬妮娅说：“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保尔第二次恋爱对象是共青团员丽达。他们同是无产阶级出身，又有相同的志趣，但是保尔认为“爱情给人带来许多不安的痛苦”，革命事业未成，不该浪费时间谈恋爱；^② 颇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气概。后来他虽也承认这在感情上会造成遗憾，但他还是相信他得到的比失去的多。保尔最后与达雅结为夫妻，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爱情存在，而是因为他觉得对这个年轻女子有使命感，要改造达雅成为“新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党的一员，成为“我们”，否则他就一文不值。^③保尔的爱情经验其实都是对革命忠贞度的考验，亦即党性的锻炼，保尔认为人的阶级关系比爱情更重要。

(3) 劳动：12岁的保尔被退学后，便在铁路车站的餐厅干活，劳动使他心安理得，觉得自己不再是吃闲饭的人。小说中对保尔的英雄形象刻画最出色的篇章是筑路；从波雅尔卡车站修筑一条直达伐木场的窄轨铁路，以便冬天提供基辅燃料。它深刻地描绘保尔与共青团员如何在冰天雪地、风雨交加的环境下工作，睡的是冷湿的水泥地，吃的是面包屑，穿的是单薄的衣服与浸入雪水的破靴，同时还得忍受匪徒的突袭与疾病的侵扰。筑路期间，保尔与其他大队展开劳动竞赛。

^①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191、404、419、424、427、442-443。

^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201-202、222。

^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384-385、426、439。

天尚未亮，他勉强移动着已经冻麻的双脚，独自到厨房烧开水，才叫醒同伴开始工作。他们工作了两周后，还要继续留在原地，直到第一批木材能够顺利用火车运送出去，才能换班。但是保尔与共青团员并没有因此感到气馁，反而斗志高昂，奋力不懈。这段情节清楚地说明了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也因此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当他患重感冒，仍在冰冷的河水和寒冷的秋风中打捞木材，结果得了急性风湿病。住院两周后痊愈，又急忙回去工作，他最怕的是失去劳动能力，不能为革命继续服务。^①

(4) 敌我、国际与性别观：保尔的敌我观与国际观皆以阶级立场来区分。他所认知的资产阶级势力指波兰、白军、美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等反革命势力。时值内战，保尔对于白军或代表外国势力入侵的波兰军队，均坚决对抗到底。他在中国的地图上插着红旗和黑旗，代表中国土地上有着亲革命和反革命势力。任何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派系都是站在敌对阵营，必须严厉打击，特别是对托派的斗争。^②他的国际观是以无产阶级立场，将世界两分成革命与反革命，分别代表进步与落后两股势力。

在性别观念上，他相信男女平等，也尊重女性。虽然他心理上一度打破男尊女卑的观念，爱上他的政治指导员丽达，但是最后他对妻子达雅所扮演的角色还是一个教育者。无论是政治意识很强的丽达或是有待启蒙的达雅，这些革命女性都被期望向男性看齐。在这个意义上，新人的性别事实上是男性。

简言之，所谓保尔精神，就是以献身革命事业为前提，爱情的基础是阶级与革命立场的正确；判断敌我情势，皆由阶级立场出发；在工作与生活方面，必须具备劳动精神，要培养钢铁般的意志，坚持革命乐观主义。

斯大林时期，只有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才可以被视为是“个人”或称为英雄。平凡百姓也可以效法保尔，以钢铁意志献身大我，而成为“个人”或英雄，有为者亦若是。^③不过，这里的英雄不是着重个人主义的“旧英雄主义”，而是以党作为集体意识依归的集体英雄主义，或称“新英雄主义”。

中共对保尔精神的宣传非常多样化。除了撷取小说部分内容编入中学的语文教科书之外，还利用其他媒介广为传播。例如成立保尔班亦是宣扬保尔精神的方

^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 8、244-264、329。

^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 88、222、331、361、427。

^③ Oleg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pp. 190-191, 197-198.

法之一。1952年，北京五中在取得北京教育局和苏联大使馆的同意后，命名了第一届“保尔班”，学生以争取优秀的成绩为鹄的。保尔班的教室还会挂着保尔的画像。①其他城市的学校也相继成立保尔班，并且以能届届相传为荣。②若干中学发起“读好书、学保尔”的活动，要效法保尔精神，忘我地为祖国劳动。③这本小说的许多情节也在1950年代初期，被中共中央指示用来教育干部理论，学习斯大林版联共党史的文艺参考资料。例如，书中描写共青团员如何在严寒威胁下，努力不懈地修筑铁路，及消灭白军残余分子和破坏分子的斗争，与托洛斯基分子的猛烈斗争，便是作为《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的佐证。④

广播与话剧也是宣传保尔精神的媒介。1949年秋天，北京新华电台即开始在儿童时间连续广播保尔的故事。至于话剧，最早似乎出现在哈尔滨。⑤更为轰动的是1950年10月由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担任导演，北京青年剧团演出的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著名演员金山饰演保尔。话剧演出近三个月，一票难求。⑥孙维世还利用乌克兰民歌〈德聂伯尔河掀起怒涛〉的曲调填上新词，改名为〈在辽阔的乌克兰草原上〉，作为话剧的主题歌；叙述白军侵犯家乡，乌克兰田野变成战场。歌词是“年老父亲忍住了悲伤，他把儿子送上战场，宁死不做奴隶和牛羊，要和敌人血战一场，……我们都是战斗的青年，我们不怕任何困难。伟大的列宁，领导我们前进，我们走向自由光明。”有些音乐老师为了对小学生讲述保尔的故事，便在课堂上教唱这首歌。⑦

再者，韩战初起之时，各界为激励官兵，寄去前线的物资中，常包括《钢铁

① 徐祖哲（当年「保尔班」学生），〈保尔精神鼓舞我们前进〉，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72296010097rl.html（2014年1月24日检索）。

② 例如，1952年中苏友好月时，昆明女一中高三三班，即争取命名为保尔·柯察金班。在保尔形象的鼓舞下，他们成了全校优秀班。毕业时，他们将此称号送给纪律、成绩均不好的初三十九班，全班有一半的人代数不及格，在保尔顽强精神的鼓舞下，毕业前全班已无不及格现象。陈兆祥，〈保尔早就来了〉，《中国青年报》，1957年1月13日，第1版。

③ 1955年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初中即发起此运动，并得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来信鼓励。见杨永明，〈要为祖国忘我忠诚地劳动—35年前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寄语我国青年〉《人民日报》1990年5月13日，第7版。

④ 见编者按，勒·查列斯卡娅，莫·查列斯基，〈学习「联共（布）党史」的文艺参考资料〉，《中国青年报》，1953年第11期，页5。

⑤ 〈新华电台今晚要目〉，《人民日报》，1949年9月21日，第4版；高莽，〈保尔精神不死〉，《人民日报》，1990年7月11日，第8版；鲁直，〈保尔教育了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怎样的人？〉，原载东北旅大区文艺报第13期，转引自《中国青年》，1949年第20期，页7-8。

⑥ 41 许国荣、左莱，〈金山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曹靖华，〈苏联文学在中国—为苏联《真理报》而作〉，《人民日报》，1952年2月14日，第3版。

⑦ 董晓敏，〈在辽阔的乌克兰草原上〉，<http://ourgoldenage.org/article-1404-1.html>（2014年1月24日检索）。

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①而各级学校的学生为呼应政府提倡的保尔爱国精神，纷纷在校成立保尔战斗队，或报考军事干部学校。⁴⁴ ②中共为配合抗美援朝保卫国家运动，有关当局赶译并上映1942年拍制的苏联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③这部由Mark S. Donskoi (1901-1981) 导演的电影，结构散漫，情节沉闷，人物塑造单调乏味。1956年由Aleksandr A. Alov (1923-1983) 和Vladimir N. Naumov (1927-) 重新执导，片名改为《保尔·柯察金》。故事内容略有更改，情节变得较为紧凑、明快，比先前电影更为生动；加上演员称职，表现可圈可点，凡是看过电影的人，莫不对保尔留下深刻印象。

1957年，中共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又为了配合中苏友好月活动，将电影《保尔·柯察金》配上中文发音，在中国大陆29个城市播放，辽宁省还派出200个电影队到山区农村去放映。⁴⁶④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盲仍占绝大多数，透过这种无远弗界的非文字媒体，它的宣传功效自然要比文字大得多。由此可知，中共宣传媒介的多元化，不拘泥于学校机关，更重视社会管道的传播，因此涵盖层面十分广阔。在苏联，共青团是宣传、研读《钢铁》小说，动员学习保尔精神的主要官方机构；在中国大陆亦然。中共共青团及其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均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惜目前限于档案资料之不足，无法有系统地了解共青团宣传与动员等实际运作的来龙去脉。但是从一些已出版的刊物，尚可略知一二。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话剧即将在北京演出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廖承志即指出，演出目的有二：1、向中国青年介绍苏联青年经过怎样的奋斗路途；苏联共青团经过怎样的途径成熟与强大；苏联共青团如何成为党的后备军。2、向苏

^① 郑延，〈介绍北京市少年儿童队的时事教育活动〉，《人民日报》，1951年1月20日，第3版；〈朝鲜前线战士渴望文化食粮 欢迎大家捐送书籍〉，《人民日报》，1951年2月26日，第2版；魏巍，〈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人民日报》，1951年6月16日，第4版；〈春节各地热烈进行抚军优属活动〉，《人民日报》，1953年2月18日，第1版。

^② 王士谷，〈北京青年团员为抗美援朝巩固国防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日，第1版；〈走向光荣岗位 为祖国人民立功〉，《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日，第2版；〈京津中南等地青年学生工人纷纷准备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人民日报》，1950年12月8日，第2版；〈以积极分子的行动代替了群众性的运动—评部分报纸对参加军干校的报导〉，《人民日报》，1951年1月8日，第3版；〈各地学生踊跃报名投考军干校〉，《人民日报》，1951年7月3日，第1版。

^③ 〈好电影介绍〉，《人民日报》，1950年3月4日，第6版；〈电影局三制片场翻译片工作者报告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3月4日，第1版。

^④ 《苏联电影周胜利结束》，《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第4版。根据作家老鬼的回忆，电影还有插曲，其中一段歌词如下：「仇恨的旋风在头上怒号，黑暗的势力还在喧嚣，我们和敌人做绝死的战斗，谁胜谁负等待我们答覆。我们的斗争，神圣而正义，前进向前进，工人兄弟，我们的斗争，神圣而正义，前进向前进，工人兄弟。」但是笔者所看的1942、1956两部电影中，都没有这首歌曲。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52。

联学习，使中国共青团更进一步群众化，提高政治觉悟，使党员具有高尚革命质量，像保尔一样。①

1957年1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来华访问，并到各级学校，包括北京大学，讲述奥氏生平事迹与宣扬保尔精神。② 北京大学共青团打铁趁热，为促销保尔精神，即以北大学生黄坚的案例，透过师生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保尔精神。

黄坚16岁时，家乡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地区，父亲也因而有了工作。他在学校曾是第一批积极分子，加入青年团。参加土改宣传工作时，他与同班女同学隶华成为好友。抗美援朝时，共产党号召参军，黄坚决心放下书本，报名参军，并说服隶华一同参加。临行前，隶华突然变卦不去。

5年后，黄坚从解放军转业，考上北大，重回学校。一次偶然机会，两人重逢，黄坚得知隶华已从大学毕业，现在科研机关工作，她与她的丈夫已在科学刊物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黄坚不禁要自问是他自己错了，还是隶华错了？黄坚自认因为进步而参军，却庸庸碌碌过了五年，如果不“醒悟”，还会庸庸碌碌过一辈子。他得到的痛苦结论是，他为了政治活动，放弃了学业，等于是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钱。岁月不饶人，生活的经验证明：忽视政治的人占便宜。这些人将时间用在学业，学到了真本领；而政治活动只是说说而已，不能解决问题。黄坚最后的结论是，过去他“太幼稚了。……对一切都是那么迷信，要追求电影小说里描写过的生活。几年来，我明白了，这种生活，这种牺牲一切的英雄，在现实中都是没有的，他只不过是作家和艺术大师们的理想而已。以往，我正是吃了幼稚的亏，现在应该老练点了。”但黄坚对这样的结论又有几分疑惑与不安。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严重地掉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曾想到要退团，省得成为团组织的包袱，也省得心里不安。但他又没有这样做，却不晓得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③

他将自己的问题投书到北大校刊，请求指点。黄坚的投书，引起了学校师生热烈的讨论。有读者认为黄坚的看法不完全错，因为用心于学业和参与政治，在

① 廖承志，〈演出保尔·柯察金的意义〉，《人民日报》，1950年9月20日，第3版。

② 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上册，页512；〈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同北京青年见面〉，《人民日报》，1957年1月21日，第4版。

③ 〈大家讨论：青年团员的称号意味着什么？〉，《北京大学校刊》，期109，1957年3月3日，第4版。

时间上会起冲突，而学生的本分就是以学习为主。①另有读者认为黄坚也指出部分客观事实，亦即如果他不参军，在学业上会有更大的成就，这对科学落后的中国贡献更大。②但也有读者提出自己曾有过类似黄坚的经历，并坚持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北大生活美好的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他也以参加这革命斗争为傲。黄坚参加韩战并没有白白浪费生命，在书本知识上虽落后，却得到更生动、深刻的教育。在革命的路上并没有停滞与落后。③这样的叙述与观点和保尔自我反省后，对自己一生做出的结语几乎如出一辙。同时，有更多的读者批评黄坚将个人名誉、地位与革命贡献混为一谈；他没有正确理解对革命贡献的问题，反而蒙上了个人主义的阴影。这些读者一致认为黄坚过去所做的并没有错，错的是现在的想法。他们呼吁黄坚应该巩固革命的人生观，不要计较个人得失，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真正的幸福是生活在集体中，共同为革命牺牲奋斗。④

最后，北京大学青年团团委会宣传部总结，应该学习保尔的精神：“那种对敌人无比的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无比的爱，学习保尔在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中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⑤黄坚的经历与问题，在当时的青年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共青团透过这样的讨论方式，无疑是要将保尔精神更深入青年的生活，树立青年热爱党、劳动与革命事业的“正确”人生观。

三、保尔典型中国化及其“正统”精神的捍卫

从内战、韩战结束以来，中共当局面临大量复员后伤残军人的心理建设，实有必要积极提倡保尔的乐观主义，顽强地、坚韧地与命运搏斗。这也是为什么《人民日报》报导革命残废军人学校或荣军教养院时，特别强调这些军人如何身残志坚，勇敢地面对肢残之后的人生挑战，依然努力学习，争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① 彦东，〈我认为学生不必做社会工作〉，《北京大学校刊》，期111，1957年3月16日，第3版。

② 石新，〈这也是客观事实〉，《北京大学校刊》，期110，1957年3月11日，第3版。

③ 王克武，〈我们爱唱这支歌〉，《北京大学校刊》，期110，1957年3月11日，第3版。

④ 〈大家讨论：青年团员的称号意味着什么？〉（系列），《北京大学校刊》，期110，1957年3月11日，第3版；期111，1957年3月16日，第3版；期114，1957年4月6日，第4版；〈大家讨论：怎样正确对待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北京大学校刊》，期116，1957年4月19日，第4版。

⑤ 团委会宣传部，〈向保尔·柯察金学习〉，《北京大学校刊》，期173，1957年11月30日，第4版。

他们因此均被冠称为“中国的保尔”。^①这些也就是 Lilya Kaganovsky 所阐述的肢体残障，依然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党国和领袖等理想献身的新人。^②

1953年，中共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重点是进行苏联协助中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而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的书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意含企图将人的意志也锻炼成如钢铁般的坚强，隐约呼应当时苏联政府工业化，亟欲跻入现代国家之林的诉求。^③

中共提倡保尔精神，亦是有意藉此推行人的精神工业化，协助中共推动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代中期，中共为解决城市青年失业问题，加上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发展国营农场需要大量工作人员，政府因此鼓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边远地区垦荒或到农村发展文化工作。^④

在这些上山下乡的人和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而被下放者之中，也有秉持保尔刻苦耐劳、不畏艰辛的精神，从事过去知识分子所轻视的工作者。^⑤大跃进时期的城市居民也被组织参加义务劳动，例如北京市民组织保尔队或学生的保尔排，劳动时高举保尔的画像，参加建设十三陵水库等。^⑥

有趣的是，保尔这位苏联英雄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在中国大陆扮演了十分吊诡的角色。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严厉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对党国元老整肃的罪行，随后他又常提对美和平竞赛，不提阶级

^① 齐纬，〈最高贵的人—访河南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0日，第3版；马少波，〈最动人的艺术〉，《人民日报》，1958年6月4日，第8版；〈同身残志不残的英雄话别：文联欢送四川革命残废军人课余演出队〉，《人民日报》，1958年8月5日，第4版；周祖佑，〈他们永远是无畏的战士—记四川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的休养员〉，《人民日报》，1959年2月26日，第6版。

^② Lilya Kaganovsky, *How the Soviet Man Was Unmade: Cultural Fantasy and Male Subjectivity under Stalin*, pp. 22-23.

^③ 余一中认为这里的「钢铁」与斯大林崇拜及其政治路线有关，因为斯大林的俄文姓（С т а л и н）的字根就是「钢」（с т а л ь）。余一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2期，页65。我认为「钢铁」一词的使用与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有关，但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无关。理由有二：整本小说并没有特别突出斯大林的角色。保尔的政治导师是红军老战士或老党员，不是斯大林。再者，小说于1932年开始连载时，苏联文学尚未有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④ 这也是受了苏联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青年垦荒运动影响。中共青年团在方法上也有模仿苏联之处。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一九五三—一九六八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40-45；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页18-19。

^⑤ 〈垦荒、筑路、种菜开始了建设山区的第一步〉，《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第4版；王昆仑，〈送女下放三首〉，《人民日报》，1958年1月28日，第8版；张正常，〈下乡锻炼日记〉，《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第4版。

^⑥ 〈四个多月达六百八十万人次 首都人民争先参加义务劳动〉，《人民日报》，1958年5月17日，第4版。

斗争。这些均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心生不满。1960年赫鲁晓夫突然决定召回全部苏联在华顾问。1963年夏天起，中共接连发表九封批判苏共的公开信，苏共也不甘示弱地回应。中苏双方的叫嚣与对骂，节节高升，中共乃以保尔“正统”精神的维护者自居，以此痛斥苏共的修正主义。

当中苏关系破裂公开化之后，中共一方面积极维护“正统”的保尔精神，另一方面也感到需要寻找取代苏联的保尔典型，推出国产的新人典型。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在众多进口的苏联新人典型中，也掺杂有少数几位本土新人典型。最早也是中共力捧的有两位：刘胡兰和董存瑞。刘胡兰14岁即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5岁为阎锡山军队逮捕，从容就死。毛泽东曾经特别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她的小传在1951年夏天出版，也是青年团员的必读刊物之一。①董存瑞在16岁即加入解放军，19岁因为舍身炸碉堡而牺牲。他的一生也被写成故事书出版，广为流传。②还有一位别号“中国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1939年5月加入共产党。抗战时，因要取出雷管的炸药，左手炸掉了四个手指，且炸瞎了左眼，国共内战他再度负伤。吴运铎虽然身体残废，仍然认真坚守工作岗位，努力不懈。他自己也承认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影响很深。中共不但大量发行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也将他的事迹描绘成16图的连环画出版。③

生于1915年的吴运铎，到了1960年代初期，已经年近半百，拿来当全国的新人典型，年龄显得太大。全国的典型必须年轻，最好已经不在人世。如果新人典型还健在，就存有种种潜在的危险，难保哪一天做出违反官方标准的事来。所以，最好找个涉世未深，易于“塑造”的青年“烈士”当典型。孤儿出身又早死的雷锋是最好的“可造之才”。他生于1939年，死于1962年的一场倒车意外。以他作为新的全国性中国社会主义新人典型，最适合不过。1963年3月，

① 刘胡兰，山西人，生于1932年，死于1947年。梁星，《刘胡兰小传》（北京：青年出版社，1951第1版，1952第3版）。

② 董存瑞，河北人，生于1929年，死于1948年。丁洪、赵寰、董小华，《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③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第1版，1957第3版）；潘力模画，《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上，下），《中国青年》，1951年第79-80期，封底连环画。根据新华社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稿编绘。最后一图是他读《钢铁》书，反覆唸着：“我只要求给我留下一点能够维持生命的东西，一颗心脏和一叶肺，我还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中共发起大规模的全国性学习雷锋运动。共青团中央呼吁青少年学习雷锋的：1、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立场；2、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关心同志，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4、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艰苦朴素的作风；5、坚持又红又专，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①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全国发行《雷锋日记》。日记所摘录的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严酷无情。”以及他勉励自己的话：“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和工作，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做毛主席的好战士。”^②随着日记和官方传媒的散播而广为人知。

继雷锋之后，中共又发起学习解放军战士王杰、欧阳海等运动。官方均为他们出版了书籍；所强调的共同特质是，他们都听毛主席的话，愿意接受组织分配的任何工作，乐于从事任何微小的善行。^③基本上，欧阳海、王杰的新人典型，就是雷锋精神的重复。他们的做人处事几乎接近完美，难有可议之处。这些1960年代官方所推出的英雄，与中共建国前后的典型有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与崇拜。

196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印了《青年英雄故事》一书，介绍的13位中国青年全已过世，其中三位女性。九位是战死或为敌人逮捕而死；一位是参加韩战时，为救一小孩而死；剩下三位则是因公殉职。他们的年龄从15岁到28岁不等。^④这些“旧”典型（他们的事迹都发生在1940、1950年代，李贡死得最晚—1959年）与1960年代的“新”典型有一点显著不同—他们没有明显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中丁佑君想要效法的对象是苏联的丹娘，黄继光引为模范的是马特洛索夫，而不是毛泽东。相比对照之下，雷锋和王杰则将自己所有的事迹与行为全都归功于毛主席的教导，并将毛的思想运用于日常生活。而在中国新版本的保尔典型《欧阳海之歌》一书中，作者金敬迈认为欧阳海天生具有阶级意

^① 《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页9。《中国青年》这一期是学习雷锋的专辑。

^② 雷锋，《雷锋日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3），页15、20。

^③ 解放军报编辑部编，《王杰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金敬迈，《欧阳海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Mary Sheridan, “The Emulation of Hero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3 (Jan.-March, 1968), pp. 47-72.

^④ 这些英雄是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丁佑君、杨根思、罗盛教、杜凤瑞、龙均爵、向秀丽、李贡、黄继光、丘少云、安业民。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青年英雄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

识，且对革命事业有无私奉献的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精神，但仍不足以为新人。他特别强调的是新人的成长在于不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必须能看出来毛的思想在欧阳海身上产生巨大威力，才算是真正的新人。①金敬迈的观点十足反映出当时中共当局对新人的新定义。

在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期间，中共认为谁热爱保尔，谁就是社会主义的正统。中国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严厉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声称苏联当前所提倡的是个人主义。他说苏联不但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士雷锋“没有头脑”、“荒唐”，而且认为保尔·柯察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保尔“那种苦行僧式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达到狂热赴死程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是过于热衷，也过于长久地加以英雄化。”②文革之初，旅苏学生亦指证历历地声称，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曾经刊出保尔精神已过时的文章，还宣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观”。③当时任何与中共官方意见相左的观点，均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苏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苏联成为中共的头号敌人之下，这样的指控可能有断章取义、流于意气之嫌。况且1966年10月4日，苏联当局还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树立他的铜像。苏共没有否认保尔精神，而是将奥氏等同于保尔，是英勇的象征，称颂他为革命献身。④《共青团真理报》的报导没有片言只字提倡“资产阶级人生观”。

整体而言，中苏交恶之后，中共对保尔精神的宣传重点主要放在强调阶级斗争与批判苏修的框架之下处理，特别是在1962年秋天，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月月、日日讲之后。如1963年《钢铁》小说以连环画形式出版时，强调的即是保尔的无产阶级出身与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⑤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程代熙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序言中称赞该小说是“一本告诉人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不要忘记过去的好书，也是一本给人长革

①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的酝酿和创作〉，《人民日报》，1966年3月1日，第6版。

② 胡耀邦，〈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人民日报》，1964年7月7日，第2版。

③ 〈我留苏学生代表愤怒揭露苏修领导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5日，第4版。

④ А. Леви́на & Э. Есман, “Правофланговый Комсомолий: В Шепетовка открыт памятник Николаю Островскому,” (共青团员的标兵: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雕像在谢比托夫卡揭幕)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共青团真理报), 4 октября 1966 г. (1966年10月4日), с.1

⑤ 王素、夏星改编，毅进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命志气、增革命干劲的好书。”^①在文革期间，保尔精神再度被中共拿来当作有力的政治武器。对外，继续用来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对内，用来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精神。1970年代初期，四人帮尚大权在握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数次打算再版梅益的译本，但是因为译者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直无法付梓。^②

文革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更反映在1976年6月，大庆油田采油三部部分工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2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经过座谈、讨论，为新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的前言：“今天阅读这部小说，会使我们更加珍爱无产阶级专政，更加憎恨苏修叛徒集团，更加坚定把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文章称赞保尔·柯察金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典型形象，在他的身上反映了整个一代革命青年的斗争历程和革命精神。“他”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侵蚀，主动地向他们发起攻击。为维护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保尔成长的道路，深刻表明：一个革命青年，不可能自发地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的烘炉中长期冶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绝裂，只有经过这样长期艰苦的斗争、学习、改造，才能百炼成钢，成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自觉战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③他们还以文革期间提倡英雄必须“高、大、全”的标准，来检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不足之处。他们认为小说对保尔和冬妮娅的感情描写，渲染过多；在描写保尔丧失健康和他的作品尚未出版时，流露某种绝望情绪，亦是一项缺失。这些都折损保尔的英雄形象。^④这些人对保尔形象提出的批评，亦表示文革期间所要求的新人典型，必须在阶级立场、道德、行为各方面完美无缺。

相较于中国新人典型，保尔的个性不够完美，却反而让人感到比较真实。他的脾气暴躁，有时还会说粗话，不守纪律。^⑤保尔个性鲜明，内心有冲突、有斗

^① 程代熙，〈译本序〉，收入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页15。

^② 梅益，〈重版后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528。

^③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72级工农兵学员合译，〈前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页1、3-4、6-9。根据1953年版本翻译。

^④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72级工农兵学员合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9。

^⑤ 保尔想转到骑兵第一军时，被政治指导员斥为蔑视纪律，带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保尔承认指导员说的都对，但还是决定转过去。而他用“奔放的感情去生活”，也被视为是不守纪律的缺点。即使后来修养较

争，他成为政治人是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一般而言，苏联的新人典型都有一段从无政治意识到有政治意识的成长过程。^①而中国的新人典型不是这个成长过程极短，就是根本没有。他们天生便具有政治意识、富有阶级斗争观念，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冲突与转折。中国的新人典型都是有骨无肉，涩而无味，更禁欲，人物平面化，没有个性，毫无脾气。他们仿佛是被捏出来的泥人，没有生命，只有教条；没有内心冲突，没有善恶之争。他们的生活中只有党与革命，更没有男女之情。这就像中国传统的京剧一般，正反面的样板人物都脸谱化，只有好坏两极；好人一路好下去，坏人一路坏到底。

四、民间的解读

虽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文革之前发行量极高，甚至是当时中译小说中销售最多者，但单从销售量的多寡并不足以完全说明实际上就是民间最受欢迎的小说。销售量高也与官方指示性的大量发行、大量购买有关，但也不该忽略当时有许多没有余裕买书的人，是透过图书馆或亲友同侪辗转借阅该书而来。如果把官方宣传的保尔精神当作是一种产品，那么一旦产品离开官方这个生产者之手，消费者要如何使用这项产品，生产者便难以干涉。这也是解读民间反应最复杂的地方：它可能有与官方宣传契合的地方，也可能出现不同，甚至完全背道而驰的解读。

呼应官方说法或接受官方宣传保尔精神的读者，不在少数。在各种官方报刊杂志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调，这些不全然都是机械式地被迫接受。他们咸认青年应该响应党的号召，愿意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重新创造美好的生活。保尔那一切为了祖国而忘我牺牲的高贵情操永远值得效法。^②当中共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时，确实有许多热血青年在保尔精神的鼓励下，积极投入各种国家建设，志愿支援新疆建设等。^③作家老鬼（马波：杨沫的儿子）还是中学生时，决定到

好，还是有按捺不住脾气，动手打人的时候。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着，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页178-9、210、395。

^① Katerina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② 王成玉，〈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一影片保尔·柯察金观后随笔〉，《北京日报》，1957年11月10日，第3版；罗明，〈保尔·柯察金给我的感受〉，《新疆日报》，1957年11月17日，第3版；叶军（北京大学），〈保尔的“得”“失”〉，《中国青年》，1957年第24期，页22。

^③ 张惠仁，〈拿起铁锹，千万不能摔倒〉，《中国青年报》，1957年11月22日，第3版；李辉、蓝英年，

内蒙古兵团劳动，而保尔在小车站上的狂热苦干的精神，即是他的楷模。^①虽然也有人是被迫下放劳改，在无尽的屈辱和沉重的劳役中，是保尔精神陪他们在泥泞中跋涉，度过他们的人生逆境。^②其实，保尔精神最令人感动、效法最多的是他在已成残废的情况下，仍能不对冷酷的命运低头，继续勇敢地迎接生活挑战。这对众多或因天生病残，或因战争、工作、意外成残者而言，提倡学习近乎真人真事的保尔精神，帮助他们度过人生难关，是最有效的精神鼓舞。例如，24岁的青年阮颂铭因风湿性关节炎长期卧病在床，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带给他勇气与希望。他决心学俄文，经过多年努力，发表许多译作。在许多城市均有类似的例子。^③又如，一位初中生廖贻训参加韩战负伤，四肢残废，只剩大拇尚能活动。他躺在床上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鼓舞其斗争意志与胜利信心，并特别效法保尔精神，努力学习写字。^④另一位因韩战失去双臂的黄仁川，因为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连环画，重新站起来，当上宣传员，也学会用嘴画画。^⑤这样的案例，《人民日报》每年总有几则报导，这与官方主流思想也可以互相呼应。

效法保尔精神很有趣的例子是高玉宝。贫农出身的士兵高玉宝，只受过一个月的教育，写十个字，就得问七、八个字，受到毛泽东质疑为何中国小说没有以耕田汉为主角的启发，决定提笔写自传。写作期间，军中有位宣传股长对他说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因此大受鼓舞。这位“文艺战士”信心满满地说：“瞎眼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能写，睁眼的我慢慢写，总比瞎子写得好。”结果写成一部长达30万字的自传小说《高玉宝》。^⑥不过，在官方表扬工农兵作家的高潮过

〈一个世纪的漫长接触和影响—关于苏联文学与中国的对话〉（上），中构网：<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12.htm>（2000年11月17日检索）。

^①老鬼，《血与铁》，页54。

^②范若丁，〈寻找保尔·柯察金〉，<http://book.peopledaily.com.cn/big5/paper17/1/class001700002/hwz1119.htm>（2000年11月11日检索）。

^③姚远方，〈苏联文学和中国青年〉，《中国青年》，1957年第21期，页7；李士媛，〈保尔·柯察金鼓舞我前进〉，《新中国妇女》，1954年第10期，页12-13、17；吴嘉，〈“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读后〉，《中国青年》，1951年第81期，页31；彭树智，〈苏联文艺作品鼓舞我战胜了疾病〉，《中国青年》，1953年第21期，页33。

^④廖贻训，〈重新战斗的开始〉，《人民日报》，1952年1月6日，第4版。

^⑤樊炳义，〈党的优秀的宣传员〉，《人民日报》，1959年5月19日，第6版。

^⑥高玉宝的写作方式：不会写的字，或写别字代替，或画各种图形符号代替，如果连画也画不出来的字，就画个圆圈。他写好一段，问人家一段，把整段字问清了，再誊清在另一个大本子上。〈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6日，第4版；高玉宝，〈我是怎样学习文化和学习写作的？〉，

去之后，他的小说乏人问津。

不同年龄层学习英雄的行为也会有所不同。大学生有大学生的解读，小学生有小学生的体会。对好动、顽皮的小学生来说，最吸引他们的恐怕是保尔在小说中几场打架的情节。保尔的调皮捣蛋最对小学生的胃口，特别是常被老师处罚的学生，对保尔在学校因恶作剧而受罚，更能引起共鸣。保尔的故事为他们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在校是劣等生，长大之后也可以成为英雄。^①作家老鬼回忆他读小学时，北京正在上映《保尔·柯察金》这部电影，他百看不厌。他认为保尔将纨绔子弟维克多打到河里那一段最精彩。这场面给他许多影响和启示，其中包括打架能够赢得美人心，“美丽高贵的冬妮娅就是因为保尔会打架才跟他好的”。他和同学们常在晚自习之后，冒着寒风，跑向宿舍之际，学保尔骑马冲锋的样子，高唱电影主题曲。他觉得这首歌有股神秘的力量，一唱起来，非抬头挺胸不可，一点也不怕冷，反而浑身是劲，“很想找个坏蛋杀一番”，同时也想体会保尔杀白军的感受。^②英雄应该残酷地对待敌人，如同雷锋后来的名言“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也是当时许多中小學生共有的想法。文革时期使用残忍的暴力对待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成因很多，其中之一或许与这种模仿革命英雄的作法不无关系。

从资料显示，官方全力宣传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要在1950年代初期，到了晚期青年的阅读兴趣似有转移。根据共青团浙江省委调查，浙江青年的阅读和欣赏兴趣，由一些官方认为有教育意义的严肃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普通一兵》、《高玉宝》等，转向中国古典文学如《水浒传》、《封神榜》、《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③就作品的艺术性而言，这些中国古典作品远比那些官方认为有教育意义却是硬梆梆内容与说教的作品，更能引人入胜。这样的心理与观众爱看古代戏，不爱看反映当前生

《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第4版。

^① 〈钢铁咋这样炼成了？〉，<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7.htm>（2000年11月17日检索）。

^② 老鬼，《血与铁》，页52、54。作者关于主题曲的回忆可能有误，电影中并没有这首歌曲，反而是孙维世导演的话剧中有，但歌词内容不同。

^③ 〈浙江省青年近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欣赏兴趣有很大的转移〉，《内部参考》，期2389（1957年12月26日），页11。

活和斗争的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①

民间解读与官方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歧异最大者，莫过于保尔与初恋情人冬妮娅的感情。他们的爱情，一直是许多青少年最喜欢的故事情节。官方所强调的是他们两人分属不同的阶级，分手乃是必然。他们两人最后一次相见时，保尔正卖命地修筑铁路，冬妮娅看到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保尔，不禁惊讶保尔“混得如此糟”。保尔则反唇相讥冬妮娅变得如此的带有资产阶级的“酸臭”。这样的言语交锋也证明了两人迥异的人生观，从此分道扬镳。自然有读者会接受这种官方强调的阶级观点，但也有不少读者阶级意识不够，最令他们如醉如痴，心神向往的正是保尔与冬妮娅的恋情，对于他们不能结为神仙美眷，感到万分惋惜。^②这样的迷恋在文革时期更为明显。当时官方特别强调的是不断革命，清心禁欲；文学禁止描写男女之情，电影也从来不会出现可能导致男女产生爱情的情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文革期间少数能够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之一，保尔与冬妮娅的恋情，对于许多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说，正好提供他们在精神上可以宣泄与爱慕的管道。当时许多青少年记得的不是官方宣传的阶级爱情观，而是冬妮娅那迷人的大眼睛与笑容，她的小资产阶级气质。因推出搜狐网站，成为大陆富豪之一的张朝阳，回忆他在1970年代担任红小兵时，对冬妮娅的印象最深，觉得她所有的一切，对于当时在物质与精神生活都赤贫的中国小孩而言，仿佛来自童话世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书里接触到关于男女的描述。^③文化评论家刘小枫也回忆到他一开始就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形象。”冬妮娅代表的是文革时不被允许存在的个人主义。^④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居官方排行榜，且受到相当数量民众的欢迎。1982年，辽宁共青团在团干部和团员间举行“荐书有

^① 〈上海各剧场现代剧目上座率低〉，《内部参考》，期2488（1958年5月24日），页13。

^② 淳亮，〈《钢铁》——那燃烧着的真实人生〉，http://culture.163.com/edit/000707/000707_31399.htm（2014年1月24日检索）。

^③ 张朝阳，〈暗恋冬妮娅〉，中构网：<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5.htm>（2000年11月17日检索）。

^④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读书》，1996年第4期，页85；刘小枫，〈冬妮娅的中国情节〉，中构网：<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10.htm>（2000年11月17日检索）。

奖”活动中，前五名的推荐书目，就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①但是进入1990年代，虽然该书在官方排行榜仍旧居高不下，^②这多少与中共官方的刻意促销与宣传有关。不过，在一般青年心目中的排行榜已经大幅滑落。1980年代初在上海高校做过读书调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列前茅。但是到1997年再做读书调查，其中最受欢迎的17本书，包括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飘》、《简爱》、《悲惨世界》等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榜上无名。^③其背后成因之一，与1980年代初、中期出现的文化热颇有关系。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仍相信代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现代化可以结合。但是天安门事件和对政治改革的幻灭，打破了这种想法，加上文化热期间西方文学著作大量出版，^④代表“革命”的苏联文学几乎完全被抛诸脑后。

19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热络的结果是出现信仰危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度先后搬上银幕或舞台，也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路学长自编自导的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结局是男主角怀抱着1950年代的理想主义，面对1990年代的现实环境，造成他的迷惘与游离心态。导演特别说明这种感受：“我们这一代人处在一种很尴尬的位置，……我们是夹在两拨人之间的一代，……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与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打架。”^⑤这已经反映出毛时代的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碰上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经济挂帅与唯我主义，其间鸿沟日益扩大；旧的信仰已崩解，新的却还没有找到。很可能由于这部电影的结局过于灰色、悲观，几乎等于完全否定官方仍然想极力挽回的革命新人的形象，电影因此经过三年的大修改，并将片名改为《长大成人》，方准上映。同年秋天，一群前卫、时

^① 本刊编辑部，〈“荐书有奖”活动揭晓〉，《辽宁青年》，1982年第11期，页24。

^② 例如：1998年，根据大陆图书市场的统计数字，这本书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第5位。1999年，以《光明日报》为首的多家媒体，评其为“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之首。于洪梅，〈解读我们时代的精神征候——对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接受反馈的思考〉，收入戴锦华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页198。

^③ 余一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2期，页69；〈上海四所大学读书调查一名著最喜爱，《红楼》居榜首〉，《重庆晚报》，1997年11月27日，第3版。

^④ 关于文化热与当时思潮的现况，参见陈彦着，裴云译，《中国之觉醒——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历程，1976-2002》（香港：田园书屋，2006），页84-151。

^⑤ 路学长生于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该片剧情始于成长于1970-1980年代的男主角周青，偶然捡到一本残缺不全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连环画，他便以保尔自居，并以书中的朱赫来（保尔的政治启蒙导师）为其偶像。电影最后于1997年底上演。于洪梅，〈解读我们时代的精神征候〉，收入《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页199-201；路学长，〈30岁对40岁说——关于《长大成人》的对话〉，《中国青年》，1998年第1期，页62。

髦的青年，将小说编成话剧。他们的童年是在保尔的小说、电影、漫画书中度过的。制作人张扬回首自己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岁月，却发现自己的青春没有颜色，无法在未来生活中找到支撑点。他想念保尔，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样东西。他要呈现的保尔是超越意识形态，具有人的高尚尊严，为生命奋斗的积极意义的范例。虽然话剧抽离了革命等政治元素，仍因票房惨淡而停演。^①1999年，为庆祝中共建国五十周年，出现了一部以保尔的感情生活为主轴的大型电视连续剧。^②该剧即使以爱情戏为主，仍难以吸引年轻族群。据非官方的抽样调查，没看过这部戏的初中生占60%，高中生占73.8%。若干看过的学生表示，如果不是老师要求他们写观后感，他们根本不会看。许多中学生也不知道保尔是谁，反而对同时段播出的港剧《杨贵妃》津津乐道。^③

从路学长的电影到连续剧的播放，保尔精神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引起社会广泛的讨论。最为赞成保尔精神的是一些中老年人，他们认为保尔的一生体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他所显现的不只是一个革命战士的优秀质量，也是一切阶级的英雄特质。^④有些人以为，保尔的革命战斗精神，在今天或许已经不合时宜，但他追求生命意义的精神，仍有现实的迫切意义。^⑤但是，这些看法在年轻的一代很难引起共鸣。即使赞同保尔精神的青年，谈到要效法的也不是他为革命牺牲奉献的精神，或坚守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要学习保尔钢铁般的意志，克服障碍，超越自我。^⑥极力反对保尔精神者，是那些觉得青春受骗的中年人。他们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表现出极左思想与斯大林路线。这本书让人丧失独立思考、正常恋爱、正常交友做人的能力。即使保尔精神仍然发光，那也只是余光，终将熄

^① 1998年元月初在北京儿童艺术剧场上演。虽然新闻媒体宣传这齣戏的轰动与卖座，实则不然。于洪梅，〈解读我们时代的精神征候〉，收入《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页202-203；赵彩婧，〈今天，我们还能“消化”保尔吗？〉，《中国青年》，1998年第4期，页58-59。

^② 深圳一家私人传播公司与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共同出资和参与制作，总导演韩刚。梁晓声，《重塑保尔·柯察金》（北京：百花出版社，1999）。虽然导演与编剧在拍制过程中，屡为剧本内容与修改发生争执，但以爱情为主轴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于洪梅，〈解读我们时代的精神征候〉，收入《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页203，注2。

^③ 〈“保尔”是昨天的英雄？〉，<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6.htm>（2000年11月17日检索）。

^④ 任光宣，〈重读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2期，页60；杜林，〈走进去，跳出来：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1期，页77-78。

^⑤ 吴俊忠，〈我们是否还需要“保尔精神”？〉，《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页10-12。

^⑥ 刘亚乐，〈给胡金梅老师的一封信〉；刘书琴（全国劳动模范），〈在工作中体验保尔〉，<http://www.zuowen.com>（2000年6月21日检索）。

灭。①他们进而责备自己的祖、父辈的中国人，“没有理性，没有宽容，没有文明，没有爱。”只想将后代培养成合格的政治动物，为那所谓革命理想，拚命鼓励人当革命英雄。但即使当了英雄，却发现世界如此冰冷，物质与精神都极端匮乏，只剩下斗争和仇恨，这种理想不要也罢。现在却又要鼓吹小孩学习保尔，等于是继续培养小孩的愚昧。父母这种怀旧情绪，是把受骗荒废的青春当作珍宝。

②

事实上，今日的大陆学生觉得保尔那个时代已经离他们十分遥远。官方传媒虽然还在大力提倡保尔精神，中宣部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中学生指定的课外读物，强调的不是革命和阶级斗争，而是保尔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试图利用保尔精神来挽救中国人民的信仰危机，但成效有限。一位初中生坦白地告诉亲人，为了老师的面子，勉强挤出励志感想，但他看了两遍小说也没看懂，真实的感受就是“保尔真惨”。许多中学生更不明白保尔吃了那么多苦，是为了什么？苏联已经解体，保尔的革命理想还是没有实现，他的苦不是都白吃了？③这样的反问真是道尽了1950、1960年代那些坚守保尔精神，一心为党为国，却受尽各种政治运动折磨者无尽的悲哀。1990年代末期以来，绝大多数学生崇拜的对象已经不是保尔，而是比尔·盖茨等事业有成的人。④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与崇美观念的影响下，多数青年认为成功者不再是刻苦耐劳，或愿意做社会螺丝钉，却孑然一身的人；他们必须是财富傲世或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除了中共当局仍高举共产主义的大旗，对于保尔的英雄典型及精神，尚在做最后逆流而上的搏斗之外，今日大陆青年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评价，实则已急速滑落，在俄国更是乏人问津。1991年之后，随着苏共的崩解，这本小说在俄国鲜有人提及，甚至出现意图解构这本小说的报导。2006年11月20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接受《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① 余一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俄罗斯文艺》，1998年第2期，页63-69；余一中，〈再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页20-25；董健，〈“保尔热”下冷思考〉，《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页13-15、25。

② 〈钢铁咋这样炼成了？〉，<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7.htm>（2000年11月17日检索）。

③ 杜致万，〈网上对话录—关于保尔和比尔·盖茨〉，《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页16-19、33；何云波，〈当神圣已成往事—世纪之交“钢铁热”之反思〉，《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卷33期1（2009年1月），页133。

④ 于洪梅，〈解读我们时代的精神征候〉，收入《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页216-219。

的采访，声称她的舅舅不是工人，而是军人家庭出身。他并非完全听从党的命令，曾经拒绝射杀白军。他在晚年对苏联当局的作为迭有批评，常说：“这完全不是我们过去奋斗所要的”。^①《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在苏联解体后对许多历史事件的报导，无法完全令人信赖，基于没有其他信息可以证明奥氏外甥女所言皆属实，姑且存而不论。但是出现这样的报导，也意味有些人想要颠覆过去官方对奥氏生平陈述，等于是间接质疑官方宣传的保尔精神。其次，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居在他死后成为纪念他的博物馆，1992年，更名为自强人文中心(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Центр «Преодоление»), 成为老兵和残障人士恢复身心健康和创作能力的活动中心。时至今日，走访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的中国人，远比俄国人多；而这些拜访的中国人之中，恐怕追悼他们逝去青春的人多于要效法保尔精神的人。

五、小结

中共学习苏联的方法，宣传新人；运用五花八门的媒介来传播以保尔为典型的新人精神。毛泽东期待中国人民都能够“六亿神州尽尧舜”，但在全国大部分百姓未成为“尧舜”新人之前，尤其需要典型作为标竿和模范；在中国的新人尚未完全成为气候之前，必须借重苏联的典型如保尔，作为中共宣传的主角。保尔精神体现了新人主要的价值观念。中共期望老百姓都能够效法保尔为了革命的理想，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牺牲奉献，甚至因此致残或丧失生命，都能够无怨无悔；同时听从党的领导，跟着党的路线走。然而，即使中共从建国初期即致力于学习和宣传保尔精神，其所强调的内容和原著小说主人翁的个性与作为，仍然出现差异，这也是中共在学习苏联新人的区别。保尔及其精神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新人具体而微的典范，另一方面中共的宣传内容因政治变迁而有不同的着重点，正显现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调整。以下各章将选用单一媒介，详述新人的单一观念在中国的宣传和政治气候下的变化，以及与苏联模式的差异。■

^① 报导见 Светлана Самоделова, “Переплавленная жизнь,” (重新评说的一生)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http://www.mk.ru/editions/daily/article/2006/11/20/175049-pereplavennaya-zhizn.html> (2014年7月19日检索)。

【“狼奶”讨论】

唯物史观献疑（二）

马昌海

五、阶级与国家理论问题

顾准指出：“马克思本人也受了极大的时代限制，马克思的古代史学，是上世纪（指19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那时还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里亚文明，除迦太基而外，欧洲的两个海上文明都是他所不知道的。现在翻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确实代表马克思的意思），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氏族方式‘在一起的土著’直接形成的国家。把历经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的国家的部族联盟等同起来；这真是天大的错误。要知道，从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到埃及、巴比伦那样从部族王基础上成长的国家之间，相隔多少历史阶段？而埃及、巴比伦那样的亚细亚国家和文明的城邦走的又不是一条路，在其间划上等号，真是误尽苍生……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①

国家产生的条件及功能：

国家的产生除了阶级对立之外，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管理。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取决于这一政权所能代表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的广度。按照我们熟悉的国家起源理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所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阶级统治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已往我们的历史研究，凡涉及有关国家与阶级的一切问题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是否会有既长

^① 《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4，第185页。

期存在着鲜明的阶级与阶级对立，又始终不具备国家形态的人类社会？换言之，是否存在早已分裂为阶级、而国家机器又非必要的人类社会？过去，由于我们所熟悉的理论并未回答这一问题，人们便对此不加考虑。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表明：这样的人类社会是存在的。一度曾被史学界高度关注的凉山彝族社会便是如此。倘若单纯从阶级与阶级对立的角度看，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社会无疑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其社会久已分裂为奴隶与奴隶主两个阶级。无论是在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上，都存在着奴隶和奴隶主的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的状况已经存在了极其漫长的岁月（至少超过一千年）。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凉山彝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久已达到国家必要产生的阶段。但凉山彝族社会的政治组织却始终没有出现国家形态，而仍然保留着明显的氏族部落社会特征。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已经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有阶级但无国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这说明国家的产生不仅仅只与阶级的出现有关。早期国家的概念，在唯物史观原有的国家理论中是不存在的。所谓早期国家，是指虽已具有国家的若干形态，但尚未发展到纯以地域组织为基础亦即恩格斯所说的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那样的发展阶段的、具有早期特征的国家。由于这种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邦国在管理、公共权力、财产分配及占有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已具有鲜明的国家性质。但在以血缘组织而非地缘组织为基础来划分居民这一点上又明显仍然遗存着氏族社会的特征。所以可称之为早期国家，以既区别于氏族部落，又区别于成熟形态的国家。以早期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三代时期的历史，是对中国历史具体研究的一个推进。

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结果以及现实需要回答的社会问题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这样一些涉及史学理论基本认识的问题：阶级矛盾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一定是不可调和的？如果阶级矛盾可以调和，那么在哪些社会条件下可以调和？怎样调和？国家的出现除了是由于“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外，还需要哪些必要的条件？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导致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等历史学的重大问题。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阶级的产生是导致国家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阶级的产生并不必然导致出现国家。有阶级而无国家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一地域的人类社会虽然产生了阶级，但倘若因环境的局限和其他条件的制约，其财富积累与内部组织与社会结构还停留在比较低

级和简单的水平，则不会出现国家。因此，国家的出现除与阶级的产生相联系外，还与这个社会的人口总量乃至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数量以及这个社会的总体复杂程度密切相关。不言而喻，国家机器当然首先代表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同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一旦出现，代表国家机器自身的官僚机构便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并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异化为整个社会对立面的可能。国家政权稳定的程度，取决于其管理的水平与能力，以及这一政权所能代表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的广度。^①

六、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存在过的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之间，并不存在生产力差异的鸿沟。哈贝马斯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典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均属于同一高度文化的社会形态”，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在既往所有论述奴隶制与封建制关系的文章里，都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在生产力上的区别标准，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恰恰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既然生产力并无截然不同，那么生产关系怎么会截然不同？列宁明确提出过区分封建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标准是“石磨”与“蒸汽机”，却并未提出区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生产力标准，原因即在于这样一种标准根本不存在。

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奴隶社会的生产力不但未必低于封建社会，而且很多情况下可能恰恰相反！作为封建制度典型代表的西欧封建社会即是如此。年鉴学派的奠基人马克·布洛赫在其代表巨著《封建社会》中曾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蛮族的入侵，欧洲的封建制将不可能出现，“日耳曼人的入侵将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强行结合在一起，打断了它们的原有进程，使许多极为原始的思想模式和社会习惯显现出来。封建制在最后的蛮族入侵的氛围中最终发展起来”。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西方封建社会早中期的社会发展程度均远逊于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同样具有启示意义的是：美国近代的奴隶制，其生产力也明显高于封建制。

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和美国近代的奴隶制，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奴隶制，因此，那种认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当容纳奴隶制度存在的生产力发

^① 王和：《再论历史规律——兼谈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展到尽头之后才会导致封建制度出现的观点，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奴隶制问题，我国史学界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认识到：就世界范围看，奴隶制社会不但不是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阶段，而且其存在甚至不具有普遍性，亦即经历过奴隶制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其实是少数。我国古代就未曾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①

只有奴隶成为主要劳动力的制度，才能被称之为奴隶社会。顾准指出：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然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希腊奴隶起源于从蛮族那里贩卖而来的战俘，并非起源于社会内部的债务奴婢。斯巴达除黑劳士外，很少买来的奴隶，忒拜、阿卡地亚等以务农为主的地方也很少有奴隶。在雅典、科林斯等邦，奴隶人数超过公民，罗马的奴隶制是对希腊制度的抄袭。罗马以南的“大希腊”，西西里诸邦，都是工商业的奴隶制城邦。大规模的奴隶制，始于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后获得的大量战俘而转化的奴隶；而奴隶一旦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就要搜罗奴隶。奴隶要成为一种劳动力占优势的“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1. 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如此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2. 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要求，只会有类似《红楼梦》中的袭人、鸳鸯这种债务奴婢，奴隶成不了制度。而这种非奴隶社会中的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理下的，比袭人的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袭人还可以升为“二房”；贾宝玉偷偷去看被赶回家的晴雯，恢复了自由之身的晴雯，比在贾府里当奴婢的境况凄惨多了）。十分特别的，雅典城的警察和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买来的国家奴隶，由国家供给粮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待遇。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由于人数少，主人与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主人可以释放奴隶（即解除其奴籍），也可以由奴隶按惯例把属于自己合法收入的钱储存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的奴隶可取得外邦人

^① 王和：《再论历史规律——兼谈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身份，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则归主人家继承。

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代的即奴隶制的（注意：马克思使用“古代”一词，指的是历史的古典时代，即希腊全盛期和罗马时代，包括奴隶制和奴隶制还未发展起来的“公民城邦”时代）、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这个范畴，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谈“亚细亚的”，于是对马克思，亦即历史的强奸完成了。^①

顾准指出：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不见于波斯、埃及、巴比伦、中国；《旧约》上也没有见过这类名词。这个名词显然起源于希腊，是城邦制度中的概念。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作“普遍的奴隶制”，即只有帝王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连大臣都不自由——比如绛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汉高祖刘邦把他的问题搞清楚了，周勃就又出来当丞相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绝对办不到的。

^②

七、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中国从未有过标准的奴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社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钱穆）。中国也只有过短期的封建社会，甚至后来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的统一行政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总形不成大势。中国更未有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如胡雪岩）亦官亦儒甚至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欧洲的中产阶级。这样，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段或五阶段模式，没有一顶帽子合适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存而不论，明智地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马克思没有做过明确细致的阐述。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手稿中指出：在大多数基本的亚细亚形态里，公社集体占有土地，分给其成员耕种；专制君主作为最高的或唯一的土地所有者高居在所有公社之上，以贡赋的形式获取剩余产品，并主管灌溉、交通等公共事务；在各个公社范围内，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手工业和农业结合为一，因而，亚细亚形态必然保持

^① 《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4，第185页。

^② 《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4，第189页。

的最牢固也最长久。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看作东方奴隶社会，还是看作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形态，国内外尚无定论（《辞海》1979年版）。因为它都不是，所以不能乱套！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出版《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了分析。他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三个特点，没有土地私有制；社会基础是村社制，每个村社通过农业、家庭手工业而自给自足；中央集权起支配作用。

顾准认为：马克思的“亚细亚”或“东方”，指的是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或帝国。这些王国或帝国，王朝的威力所寄，在于农民的贡赋和“兵役——徭役”。这和滨海的工商业城邦，国家的威力所寄是海上贸易的军队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最大要求是“教民耕战”，耕战的民绝对从属于王朝。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没有“政权”，只是有战功可以授爵，他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的一切财产，王朝可以随时征发，他的产品，甚至不能自由出售。中国很早就有盐铁专卖，埃及的榨油是王朝专利的。在这种情形下，拿合乎西方传统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来套用或对待这种“赋税农民”是格格不入的。^①斯大林不顾马克思的本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干脆阉割掉了，把欧洲社会发展的五种生产方式，即五种社会形态公式化、教条化了。

中国古代从“众星拱月”——“群星璀璨”——“烈日当空”的历史进程：

由于周革商命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相对较小，周朝不仅继承了商朝的物质及文化成就，还继承了它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开创不久即趋向繁荣。

“封建”一词，起源于西周文王创立的“家天下”制度，“家天下”制度由“分封制”、“宗法制”（一妻多妾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和“礼乐制”三部分组成。周文王是“天”的长子：“天子”。周文王打下天下之后，无力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地控制广阔的疆域。周天子于是除留下最大的一块国土之外（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把其它土地分封给他的兄弟（包括同父异母即各个“妾”生的“庶子”）、儿子和其他皇族，还有功臣及前朝贵族；这些皇族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的“诸侯”（公、侯、伯、子、男）：所谓“封建诸侯，以藩王室”。

^① 《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4，第189页。

“诸侯”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同姓宗族的大宗，也是实行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作为小宗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各自封地里又是同姓宗族的大宗，其封爵仍由其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作为小宗分封为士子。这样，根据宗法制和分封制，便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宗族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制机构。于是就形成了很多有着各自主权的、大大小小的世袭独立王国，可谓“众星拱月”的局面，月亮只有一个：周天子，其它大大小小的王国都是星星。中国封建制度是一种由部族联盟慢慢沿化而来的古老政体，它的最大特点是：拥有土地的领主同时拥有政权，而且政权在封疆内是世袭的。在一国之内，其它任何国君，包括周天子在内，都是不能随意干涉别国内政、不能随意进入的，这就叫“封建制度”（约公元前 1066——前 771 年）。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300 年（十代）过去了，情况就有了极大的变化，“都是月亮惹的祸”：到西周末季，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古老封建政体的外壳被冲破了。这首先表现为，那些经营得力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国，普遍有了忽视、甚至挑战周天子权威的倾向，而周天子也无可奈何。继而，各封国开始自由结盟，自由地决定对他国的战争；而且在各封国内部，那些对自己领地经营得力的卿臣们，也不安心旧礼法安排给他们的位，开始阴谋杀君逐君，或者架空君主。各封国为了在失序且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中求生存，为了控制国内的政局，不得不设法增强综合国力，并且将国内的权力向君主手上集中。基于此，它们不得不放弃贵族世袭制，任人唯贤；不得不削弱卿大夫的实力，尝试着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设直辖县；不得不废弃井田制，制订针对全民征税的政策。

周王室式微以后，诸侯们你争我夺，中国就进入了“礼崩乐坏”、春秋争霸的时代；再到后来，诸侯国里的大夫们，大夫国里的士子们，士子国里的家臣们也你争我夺，中国就进入了“天下大乱”、“群星璀璨”的战国称雄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就由此瓦解了。面对封建制度的崩溃，哲人们纷纷出来贡献自己的救世方剂。其中老子、孔子学说的主旨是拯救封建制度；而法学说的主旨是埋葬封建制度。法家顺应了时代大势，他们成了胜利者。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各国，建立起以郡县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就进入了秦始皇“烈日当空”的一统天下。

顾准还将中国和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比较，他说，秦汉以郡县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其完整的说法应该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和绝对君权三位一体的结合，其核心是君权的绝对权威，明代的宰相可以当众受庭杖被打死。而在西方，封建关系并不限于“授土”和“效忠”两者，这种权利和义务，成为关系双方都必须信守的契约，并不仅仅是被封者对授封者负有义务，在王侯作超额索取时，受封者可以反抗。倘若授封者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君权，那就是专制主义，那就不是封建主义了。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民议会的实际起源。其所以如此，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因素：（1）罗马法的契约——有关权利义务的传统影响；（2）和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一个宗教权威，即使是强大的诸侯，要想如我国春秋时代那样兼并、吃掉对方，会受到强有力的牵制和反抗，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宗教权威，这是他受不了的。^①

八、历史创造者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坚持这一命题的人无法抹杀“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采用的办法就是将“英雄”也当作“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或是转而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从1984年《历史研究》发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到1987年，黎澍先生几乎是孤军奋起，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这两个似是而非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对历史“主体”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项羽的战略战术，韩信的向背都对其后的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刘、项、韩很难被纳入“人民群众”的范畴，他们显然是“英雄”的“个人”。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黎澍先生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部分时间“人民群众”都是处于被奴役被统治的境地，对历史的进程并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多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文化艺术上的创新，都是由个人完成的。这些人可以被称为其领域中的“英雄”，却很少是可以被照类为“人民群众”的。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黎澍先生指出：“历史是人人的历史”，历史上的“每个人生活着和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

^① 《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4，第201页。

黎澍先生还追本溯源，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命题来自于苏联哲学家尤金，指出他推论命题的逻辑谬误，并且引用马恩的原著，指出他的命题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相左。

黎澍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出自1945年范文澜先生发表的文章。黎澍首先指出“主人”提法的非科学性，继而根据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论证，否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说法。黎澍先生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论证是对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须表现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①

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名言：“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本善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能获得罢了。”^②■

^① 《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33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72--173页。

【“狼奶”讨论】

狼、“狼奶”及其它

朱 特

1966年的8月，在我生活的北京城里突然充满了令人恐怖的血腥气。在狂热的“革命”口号下，我的同龄人——当时的中学生们——就是这血腥的制造者。一些自诩血统高贵的“革命小将”充当着“伟大统帅”的急先锋，向着“牛鬼蛇神”大开杀戒：先是学校里的领导再是老师然后是社会上的“政治贱民”。这些以京城“红二代”为主的出身“红五类”家庭的中学生们，就像嗜血的狼崽，嗷嗷叫着扑向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一时间，京城里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可以说，血腥与惨烈的文革始于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大乱校园和对先生们的大打出手。

许多年之后，人们在反思文革暴行时常常会问，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学生，为什么一夜之间，竟成了杀手与打手？痛定思痛的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狼奶”从何而来，谁又是狼？

通过网络查询，我惊讶地发现，“狼奶”竟来自于1979年邓立群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同志们，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如果这是真实的，看来喝“狼奶”的并不只是“祖国的第二代”，他们的长辈——横刀跃马打天下的那代人也是在“狼奶”的哺育下成长的。那么，下面的问题是：产奶的狼又来自何处？

答案是，皇权专制。两千多年来，从始皇帝到汉武、唐宗、宋祖，再到明清，都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的以家天下为特色的皇权专制制度，其本质就是专权，维护权力的家族传承，不准外人染指。两千多年虽然朝代更迭，但皇权专制的家天下特色没有本质变化。皇权专制形成的专制文化就是产“奶”的狼。它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所占的权重比任何一部分都要大。

皇权专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要求的是有一个圣明的天子，有清正廉洁为民做主的父母官。百姓们可以匍匐在地上对圣明天子山呼万岁，也可以给父母官下跪叩拜，要的只是饱暖无忧平安无事。被统治者对统治

者的压榨与盘剥，在尚可忍受的情况下都是逆来顺受，认同其统治。虽然两千年历史上的每一页都写着吃人的字样，但人们宁可当太平犬也不愿作乱离人，只有那实在不成器的皇帝老儿让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子民们才揭竿而起。而新的政权依然是家天下。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当然也包括专制文化）已经浸入到民族的基因之中，不管哪一个政治派别掌握了统治这块土地的权力，都离不开专制的实质。这就是民族的宿命！

1949年，中国大陆上又诞生了新的大一统政权，掌权者是在此前两个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对这块土地的统治权而大打出手的胜出者。新的国家的确不是皇权专制的家天下，执政党宣称它是人民共和国，但又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理论家对它的解释是：权力掌握在人民手里，是一个占绝大多数人的集团（无产阶级）对一个占极少数人（资产阶级）的专政。“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是这个政权本质的最浅显的告白。执政党为了区别与两千年的皇权专制根本不同，告诉人们，是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据某些人云，这几乎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真理）武装的政党建立起来的崭新的政权。如此表示也是想告诉对两千年来的改朝换代习以为常的此方百姓，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虽然胜利者信誓旦旦地宣称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权，但是一句“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道破天机，这个政权不管它有多“新”，它也是在有着两千年皇权专制养成的沃土中诞生出来，它的“新”与“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权力来之不易，十数年的争斗如同绞肉机，无数条生命的失去，以致哺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里都渗透了殷红的血。权力是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不仅要对它格外珍惜倍加爱护还要使它传之万世，“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为了维护权力的稳定与延续，执政党在一手抓“刀把子”建立强有力的专政机器外，另一手则是狠抓“笔杆子”，即对全社会进行除旧布新的意识形态教育。从权力者的角度来说，这是完全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庞大工程，它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各种形式交叉在一起，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维护权力的稳定与延续至永远。

打造合格的权力接班人以致百年之后不被挖坟，是马上打天下一代人的不了心结，校园里的意识形态教育自然是重中之重。阶级斗争教育与感恩教育可谓核心。孩子们被告之，首先要感激伟大领袖及执政党。没有他们就没有新社会的幸

福生活，现在的一切都是他们给予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旧社会是万恶的，地主资本家是十恶不赦的敌人，虽然被打倒，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还要想夺回失去的天堂，而他们一旦得逞，劳动人民就要受二茬罪二遍苦。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外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虽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国家的周围却被帝修反建立起来的包围圈围着……“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泾渭分明。这些教育手法随着意识形态管控的逐步加强，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在课堂、在校外，在游戏中、在唱歌舞蹈中，如同水银泻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孩子的大脑正如一张白纸，在它的上面写与画留下的痕迹最清晰最深刻，何况是强力灌输，最初收到的信息甚至要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9年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皆冠以阶级斗争的名头，被说成是与反动集团残余势力斗争的延续。斗争的直接后果是除了明面的敌人之外，又制造出千千万万暗藏的阶级敌人。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被说成伪装潜伏在人们的身边，时刻在窥伺方向以求一逞。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使“花骨朵们”更加深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出色的人物就成了他们学习的榜样。

青少年时代是人的形塑期，是求知欲最强烈、思想最为活跃、接受能力最强的阶段；也是血液最易沸腾、情绪最易冲动，做事不计后果的阶段；还有点被人当枪使、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傻二特色，单纯幼稚、好学轻信是青春期的全部。在这个时期，社会上能够听到的不同的声音不仅被打压封杀，还被当作阶级敌人进攻的反面教材被批判被整肃；凡是能够看到或是通往更广阔天地的门窗被封闭关上。他们被告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主义可以被称为真理，只要用一个思想充塞头脑就足够了；这个世界只有两种颜色，不是红的就是黑的；只有两种植物，香花和毒草；两个声音，无产阶级的与资产阶级的。无须独立思考自主分析，也无须怀疑辨别，辉煌的前程已经指明了，只要永远忠于永远紧跟永远听话向前走就是了。最使“花骨朵”心潮澎湃的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最不一般的时代：“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特让青年人具有使命感的是：他们将是亲手埋藏帝修反的一代人。“世界是你们的”，一句话让多少青年人热泪盈眶，以致一些东施效颦的红二代们在文革初期也喊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

们的国家”……三十年后，这些话成了现实。

意识形态教育最后落实到两个字：“爱”和“恨”。爱与恨交织在一起，愈是表现出对阶级敌人的恨就愈显示出对领袖与人民的爱；要想表现心中的爱就要显示出心中的恨。从恨的表现中让别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这才是更重要的。可以说爱是恨的核心，恨是爱的外在表现。从1966年的京城“红八月”中就可以看出，那些打人凶狠出手野蛮的学生被同学视为爱憎分明阶级立场坚定的“革命小将”。于是，争相打人成了比谁“革命性”更强的象征。

1966年文革前执政党对中学生们的意识形态教育是成功的，伴随新政权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被打成执政党所希望的人。随着“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甚嚣尘上，点燃一代青年人渴望斗争的激情就差一颗火星了。而“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出现恰当其时，一颗火星燃起通天大火，京城的中学生再无心上课，他们需要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课。“仇恨入心要发芽”，他们要充分、淋漓尽致地表现他们的爱恨情仇，所做的一切也少不了向领袖显示忠心、爱心的意图。疯狂的“革命小将”在伟大统帅的推动下，露出尖尖的小狼牙狠狠地咬向了“阶级敌人”，尔后又在“要武”的号令下，冲上社会制造出了血腥的让京城寒意逼人的“红八月”。“狼奶”所积蓄的狼性被彻底释放，出现了文革发动者乐见的天下大乱。■

【评论】

“红色读物”解读

——“高玉宝现象”简论（一）

潘祛病

一、“高玉宝现象”的由来

说高玉宝和他的《半夜鸡叫》是一个时代的神话，不算夸张。40岁以上的中国人，只要在大陆念过小学，基本熟知这个人、这段故事。夜半三更，原本鸡不会打鸣，可高玉宝笔下的鸡就那么神奇地、没有情理地叫了，而且一叫几十年，^①它不仅啼出了农民虚幻的阶级爱憎，还叫响了高玉宝的大名，使之由此跻身于作家之列。尽管随着《暴风骤雨》节选和《收租院》等课文从教材中剔除，^②《半夜鸡叫》好像也不那么嘹亮了，但神话依然存在：

——2009年《高玉宝文集》（以下简称“文集”）问世。^③这是一本同名自选集，作者把能够代表自己价值观和文字水平的个人创作，按诗歌、散文随笔、新闻通讯、回忆录、书信和演讲稿等，分门别类，有选择地收录了28万字，^④结集出版；

——2011年，45万字的传记《真人高玉宝》发行。^⑤封面题名“真人高玉宝”，由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手书；扉页“学习高玉宝同志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为应届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亲笔。^⑥

军内高级别领导对《真人高玉宝》一书如此垂青，端赖高玉宝几十年如一日的笔耕、“舌耕”——自长篇传记《高玉宝》问世后，高玉宝笔耕不辍，“舌耕”

^① 1988年大陆小学课本中还有《半夜鸡叫》的故事。

^② 1990年代后，这些与中共土改相关的文章陆续被从中小学课本中剔除。

^③ 作者高玉宝，大连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1000册，28万字。为作者自选文集。

^④ 这本文集的有选择之处在于：在选取文章的时间上有明显的，但却没有具体说明的断裂，如诗歌从1950年到1963年，接着就是1976年怀念毛泽东的一首，以后就都是1980年代后的作品了。其他类别文字断裂的时间基本同出一辙（当然极个别自选文章除外，此现象在下文中会被单独讨论）。

^⑤ 《真人高玉宝》，作者莫树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

^⑥ 文中提到的军队领导都因腐败下台了。

更是勤勉。^①据《高玉宝文集》透露，从1952年第一次在北京绒线胡同小学演讲起，至2000年后，五十多年中，他在全国各地的演讲超过5000次，听众多达500万人次。为此，高玉宝先后获得军队著名作家、沈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沈阳军区学雷锋标兵（荣誉金质奖章）等头衔、荣誉无数。^②并且赢得了顶头上司不舍昼夜的眷顾，国家领导人不知疲倦的接见。

五十年来，无数英雄豪杰被革命的“绞肉机”吞噬，无数名家硕儒在政治运动中消失，名人英模高玉宝却创造了中国奇迹——不但绍续着历史的光荣，而且“苍龙行雨，老树新花”，无惊无险，平安福泰地来到了后毛时代。中国文化史由此增添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红色文化编码——“高玉宝现象”。^③

够得上被称为某某人物现象或某种文化思想现象的，应该是对特定社会中，人们物质生活或者思想文化变迁，产生一定正面或负面影响的事物。例如气象预报中一提到环太平洋西岸某年夏季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一定预示着东亚地区一个季节甚至更长时期会出现反常气候。那么存在半个多世纪的“高玉宝现象”，它是正常还是反常？让我们从那个刚刚参加革命军队时的高玉宝谈起，看看这个现象的演化过程吧。

二、“大米干饭”加“思想饭”

由高玉宝成长为高玉宝现象，不是朝夕之工。几十年来，伴随高本人政治上不断进步，这个现象经历了从形成、提高、巩固，直至臻于完美的过程。要看清这个过程，还需要从高玉宝阶级觉悟是如何形成说起。

1947年，高玉宝刚参军，在连指导员启发大家诉苦时，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当时是地主养活穷人呀！地主家有地、有钱、有房子、有骡子有马，还有这个作坊，那个作坊的。他们雇穷人干活，不光给饭吃，到了年底还可以给

^① “舌耕”一词出自《半夜鸡不叫》，是作者对高玉宝常年频繁在全国各地宣传演讲的概括性表述。根据口径不一的统计：高玉宝从1950年代到2000年后，在全国各地共演讲超过5000次，听众超过500万人次。

^② 《党的恩情比天高》，《老同志之友》期刊，2011年8月1日。或：《给王照华同志的信》，《高玉宝文集》，页169。

^③ “高玉宝现象”在《真人高玉宝》中348页和封四中郭米克审稿札记中被两次提及，这个词汇都是被该书作者和评论者引用，但出处没有注释。在348页只简单地表述“那些承载着高玉宝精神和品德的‘高玉宝现象’、‘高玉宝效应’，薪火传承，一定会再呈燎原之势。”

点粮食和佣金。要是在家里，经常连饭都没得吃。这不是明摆着地主养活穷人吗？”

① “心里怎么想”是出自本真；“就怎么说”是没有顾虑利害得失的经验。这段话不仅是没有政治头脑的高玉宝的生活体验，更是他目力所及农民朴素生活的概括。

可时间不长，高玉宝就成了他所在团的诉苦先进典型，带头要求上前线的榜样。如果不站在历史情境中思考，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高玉宝伶俐，会迎合上级意图；表现积极，应该能得到实惠。但，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高玉宝1927年出生于辽宁省瓦房店市一个小村庄。1945年，这里成了解放区。晚年高玉宝回忆：“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家乡农民“支持和投身解放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②1945年秋冬，林彪率10万人马出关，1948年，成立东北野战军时，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103万人。③兵力增加，与东北解放区土改直接相关。土改是把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等分给贫苦农民，换取他们当兵上前线与蒋介石军队作战的直接动力。可以说东北土改为辽沈战役，甚至为其后的平津战役，甚至“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兵源是当务之急，尽快清洗农民头脑中的“糊涂认识”，使他们从心底生长出刻骨阶级仇恨，成为彼时解放区的首要任务。

比起给知识分子“洗澡”之困阻，给战士洗脑要温和容易得多。高玉宝记得，当他道出自己对本真的认识，连指导员不仅没批评他，反而“笑逐颜开”、“不慌不忙”、“平和语气”地给战士们算开了账：④什么地主雇佣了多少长工、短工，一年会给雇农多少钱粮，地主余粮多少，会如何放高利贷……从经济账到剥削账、压迫账，直至政治账。这时候，大字不识一箩筐，⑤甚至连简单的加减法应用题都算不出的高玉宝，⑥哪里还能算得来这些！在他心中，指导员的话肯定就是真理了。

现今，已无从考证高玉宝家乡激烈热闹的土改征兵，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场景。

① 莫树吉，《真人高玉宝》，页54。

② 莫树吉，《真人高玉宝》，页53。

③ 风临酒把2，《十万大军进军东北的主力是林彪的115师》，2015年7月2日摘自 www.360doc.cn/article/9742787_370269502.html.20140419

④ 《真人高玉宝》，页55。

⑤ 1948年高玉宝写入党申请书“我从心眼里要入党”几个字时，是连写带画。到高晚年，这个书画形式的入党申请书被高做成名片，到处送人。

⑥ 《高玉宝文集》，页157，“老师当众问一道应用题叫我答一下，也弄得我头晕眼花。什么叫应用题？我站立了十几分钟，急得汗流满面也回答不出。”

《真人高玉宝》，页122，“什么叫加减乘除？什么是九九乘法表？怎样列算术题等等，他都一无所知。”

但发动农民诉苦，残酷斗争地主，是各解放区相同的戏码。一本薄薄的“业务学习资料”（下文简称资料）——《介绍几种政治教育方法》，^①详细介绍了当时连队开展阶级教育的经验，呈现出土改思想教育的部分情景：^②

吕顺保同志知道诉苦运动是提高战士阶级觉悟最有效的办法，就调查全连有多少贫雇农、赤贫、工人出身的，谁家爹娘受地主阶级剥削大，谁家爹娘被逼的寻了死上了吊……根据每个人的“苦”画成画……诉苦会场布置的像个灵堂……吕顺保同志没有登台，全场就痛哭失声了，从早饭后，直哭到午饭前。……有人说：“你把诉苦当饭吃还行？”吕顺保同志心中有数，回答道：“诉苦，就是饭，是顿思想饭”……

从吕顺保政治思想工作方法在全军推广的情况，^③笔者能感受到高玉宝所在部队的阶级教育氛围。那时中共军队中战士普遍文化程度很低，思想工作方法简单，逻辑经不起推敲。^④但“思想饭”是各解放区军队思想教育的“主食”，这个饭高玉宝一定也没少吃。当然，光吃思想饭，也未见得就真能有扛枪打仗的动力。唤醒仇恨的同时，还要让青年农民直接感受到革命部队的温暖才更有效。

在高玉宝入伍第一天，新兵们吃了一顿“大米干饭加猪肉炖粉条。“这是我

^① 《介绍几种政治教育方法》是一本没有版权页的37页学习小册子，出版年代不详，封面有“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印”字样。该手册第37页上有钢笔草书：“第一遍阅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到十一时”。显然手册出版日期在此前。手册说明中写道：“这几篇材料，选自四野政治部宣传部编的业务学习材料，其所介绍的教育方法，虽然整个形势和我们所处环境已有很大变化，但仍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其中有些经验介绍的写作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

^② 《介绍几种政治教育方法》第30至34页有如下内容：“介绍阶级教育的四点重要经验：第一点是实际对比教育法。这是启发战士正确认识两个阶级，两个政权，两个社会，两个前途的有效方法。对比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敌我对比”，一个是“贫富对比”。第二点是诉苦教育。第三点是来自群众中的阶级教育。吕顺保同志最善于抓机会，发动群众聘请劳动人民教育部队。第四点是点滴教育。吕顺保同志自称是“机会教育”。……用明确的阶级立场加以分析……”

^③ 吕顺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爱兵爱民模范。河南省内乡县。历任班长、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组织干事、政治协理员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立特等功2次，大功4次。延安《解放日报》曾号召全军向吕顺保学习。1950年9月，他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1956年9月转业到地方工作。1989年9月6日病逝。2015年7月20日摘自“好搜百科”。
baike.haosou.com/doc/6632542-6846345.html。

^④ 在吕顺保的教育实践中有这样一例：“战士李景福发疟子（发烧打摆子），走不动路。吕顺保同志启发李景福说：“李景福，你为什么要发疟子？”李景福说：“我在路上偷喝了一口冷水。”吕顺保同志又问：“你为什么要偷喝冷水？”李答：“我干渴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喝了一口。”吕又问：“你为什么要干渴？”李景福有些不大高兴，带着点气愤回答他：“扛六〇炮，一走这么远怎么不干渴。”吕顺保同志紧接着又追问下去：“要是没有蒋介石反动派制造内战，压迫人民，我们要不要行军？要不要扛六〇炮？”李景福一经这话的启示，恍然醒悟，大声地说：“要是没有蒋介石反动派，咱们干脆用不着这个！”吕顺保接着解释到：“你要知道，你所以要行军，扛炮，干渴，喝冷水，发疟子，就是因为中国有了蒋介石反动派，”他特别加重语气的又说了一句：“李景福，你的疟子是蒋介石逼的发起来的呀！这个根你可得闹清楚！”一句话，激动了李景福，他站起来说：“指导员！咱们走吧，我身上发冷，扛机枪炮出些汗就行了，为了消灭敌人，有病也得坚持。”

有生以来吃的第一顿大米干饭，”，^①当时整整吃了三大碗白米饭的高玉宝如是说。当然，与猪肉炖粉条配套的不光有大米干饭，部队还发给战士们被子、床单、褥子；雨衣雨鞋，甚至牙刷、牙粉、香皂，肥皂。“袜子好几双，军装好几套”。^②特别是，高入伍不久，就被评为“模范战士”，^③团里奖给他白毛巾、土黄色毛袜子，还有老百姓做的“拥军鞋”。当高拿到这些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奖励时，“一股巨大的暖流流遍了全身”。^④党的关爱真是要超过父母爷娘了。^⑤饱暖滋养身心，“思想饭”充实灵魂，高玉宝简单本真的直觉，逐渐被洗涤干净。

1940年代末，是只剩下国共两支“武化团体”角逐中华，^⑥胜负基本可见的社会变革时期。中共不遗余力推行土改，大多数底层农民得到实惠；描绘和平美好社会远景，与民众对安定生活的渴望高度契合；加之部队环境相对封闭，密集的思想教育洗脑，高玉宝进步很快。他顺从现实的召唤，要求进步，积极表现。从在新兵团成为诉苦教育典型后，直至随军进入中国西南，他先后立功授奖6次，成为所在团优秀战士。

土改、参军、诉苦、立功受奖，这个过程成为当年许多农村有志青年的人生起点。高玉宝同他们一样，从此登上一趟所谓向着共产主义进发的专列。这趟专列，将载着时代的憧憬，向着毛泽东企盼的“新的世界新的人物”进发，高玉宝将在这个新世界中升华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未完待续）

^① 莫树吉，《真人高玉宝》，页 59。

^② 莫树吉，《真人高玉宝》，页 93。

^③ 莫树吉，《真人高玉宝》，页 53。

^④ 莫树吉，《真人高玉宝》，页 53。

^⑤ 土改时，高玉宝家分到一些新棉花新棉布，在他参军时，家里给他做过一身新棉衣裤。《真人高玉宝》，页 56。

^⑥ 王学泰，《文化被“武化”，只因商业化》，《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22日。“那时（1945年8月）有个所谓参政、议政的机构名为‘国民参政会’，也邀请了共产党参加，然而却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邀请的。毛泽东俏皮地说，我们不是什么‘文化团体’，我们有枪，我们是‘武化团体’”。

【述 往】

关于高考录取的回忆片段

北京大学 胡双宝

1959年，在北京录取中文系的学生。取二十八个人。录取的学生，分数都在80分以上，但不都是分数最高的，一方面要注意学生的表现，同时也看语文、外语的分数。以后历次录取都是这样。到中午，完了，要回学校。教务处向景洁翻看检查以后，说可以走了。八月底，新生复查，中文系北京地区29人。多出一人，是张少华，75分左右，市委常委、教务长崔雄昆签的字。这个考生的名字，当初录取时没有看到，因为没有要80分以下的材料。即使看到，也不会录取。——各校必定比较注重录取高干子女。如果有条件，可以查一部分学生的入学分数。1963年我在市招办工作，录取前，接到北大教务处负责人的电话，问贺鹏飞的分数，一查，只有60分多一点，此人没有报北大，报的是清华，后来清华录取了。这年北京地区女生比较多。1964年北大社教期间，该年级毕业留校，担任系团总支书记的俞信宝在会上作为问题提出。我没有回应。因为是按标准录取。

1961年，北大在山西招10人，让我去，兼管北师大大的8人。很简单，当然也顺利。

1962年，中文系北京地区是我录取。

1963年5月初，让我到北京市高校招生委员会人事组工作。人事组的任务是政审。去了，宣布政法学院某系总支书记李僧是组长，我是唯一的副组长。李僧不常来，我是每天必到。我其实没有多少政审经验。组里三十多人，大多是长年做人事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学校的人事科科长。大家合作很好。我主要是抽查别人初审的。还不时有人拿着不好确定划等级的来讨论。我们跟各中学依据的是同一标准。但各个学校之间有宽严不平衡的情况（大多偏严），所以我们适当调整。按规定，划甲类的可以录取绝密专业，乙类可以录取机密专业，丙类只可录取一般专业。学校划了丁类的，我们不复查，也就是我们没有把学校划入不宜录取，改为可以录取一般专业的情况。——当时我想到，这项工作应该做。跟李

僧商量，觉得比较麻烦，至少，需要跟中学沟通，并且应该取得区里同意，在那个时代，还有些费力。主要不是怕冒风险。

录取大致结束，统计没有录取的考生的情况，平均分数80分以上的有几十人。李僧上年就是组长，他说，62年，80分以上没有录取的只有8人。——1962年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第三年，政治上宽松。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决议。这一精神，1963年还没有贯彻到各个领域。63年8月底，全部录取工作完成以后，有两天接待考生，落榜考生询问没有考上的原因。我接待过一位一零一中的女生。接过她填的单子一看，叫蒯文榕，没有印象。全市一万多考生，“问题”考生，应该有印象。按报名号一查：报考理工科，平均分数90点几；丁类，不宜录取，原因是跟右派父亲划不清界限，班主任是连树声，教过我，1951年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教学效果很好。那时候，考生不知道考了多少分。我只能说，考得还可以，录取不录取，决定于学校。考生很客气地走了。当年教写作课，东语系40人，英语系10人，内有一零一中学毕业的刘胜利，没有想过她跟蒯文榕是同届同学；1991年，刘胜利从北京地震局调到出版社工作，有一次我问起，刘还有印象：大高个儿，学习挺不错。90年代中期，一次北京市语言学会开理事会，跟连老师坐一起，我问到蒯文榕，他说不记得了。像这种划不宜录取，肯定不是班主任一人说了算，而且主要不是班主任的意见。前些天网上查，蒯文榕，1946年9月生，外祖父姓聂，是安徽大家族，她的曾外祖母是清朝左宗棠之女，高外祖母是曾国藩之女。她现在在澳大利亚。估计当年没有考上大学，找了个工作，三年后就是文化大革命。1979年右派问题改正，是又一个十六年。这个姓比较特别。这年还接触到几个有事（有问题——编者）的名字。

1964年，我再次参加人事组的工作，还是副组长，组长是北京工业学院的人事科刘科长，他们的杨副科长也是副组长。记得还有另外两名副组长。全面按军工院校标准审查。这一年，我具体做了些什么，完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这年京剧现代戏汇演，我看了多场。有一张月票，省花车钱。

1964年初冬，北京大学开始社教，就是城市四清。头几个月，工作队按烂掉的单位对待。65年1月间，中央发现纠正。夏天，北大总支以上干部在国际饭店多日开会。全校的北京地区的招生录取，派物理系总支书记曹芝圃带队，我

和俄语系鲍良骏是副组长。我跟市招办的人熟，许多事情是我出面联系。虽然政治尺度比较严，但有中宣部批准的政审标准在。录取第三天，教育部学生处处长李立群，拿着五份还没有录取的理科高分学生档案找我，要求或者希望北大录取。我查看以后留下三份，并且说：“这两份给清华。”跟李处长打交道两年。她通情达理，我也按政策办事。她是高岗的夫人。

1978年，在大兴录取，连续去两天。

1979年，在顺义，录取了清华园中学的柳家旺

。这次是系总支书记吕梁一起去。这个学生的语文分数不高，作文只有20分（满分40分）。我翻看，觉得通顺，按我当年参加阅卷掌握的标准衡量，应该是28分。我和老吕商量，要了。让清华园中学也有上北大的。

1980年，教育部要求北大计划外招民族班，内蒙古30人。全校去四人，我们总支书记吕梁带队。这次，是完全看分数，因为是招民族班多少人，分数必比普通班低几十分。

大学招生考试，现在公布分数，过去从不公布分数。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表现1977级招生可以查分，那是艺术，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述 往】

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的“教育”

北京地质学院 唐振权

1962年的1月中旬，由于从1959年以来出现的不求实际的冒进、浮夸、瞒报、造假，农村里大刮共产风，坑害农民；同时又是自然灾害，农业主产区都发生了饥荒，饿死了人。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国家经济急剧下滑，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的工作会议，全国各地，省地县级以上的主要干部全都参加，共有七千人之多，加上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坐满了人民大会堂。习惯上称作七千人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从未有的。刘少奇代表了党中央做了报告，承认困难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要求立刻纠正各种过“左”的做法，特别要制止农村中的“一平二调”风（一是平均主义，二是无偿调拨物资，主要指粮食、牲畜、大型农具），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七千人大会

之后，人们受到鼓舞，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国家的经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接着农村中开展了“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目的是彻底清查混乱的经济和粮食的收支，整治那些胡作非为伤害农民利益，贪污腐败的村、乡干部。这本来是刘少奇管的，挺好的一件事。进行了一段时期后，毛泽东插手过来，把“四清”运动改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加强阶级斗争的内容。在农村彻底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教育农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鉴于美帝、苏修对中国的威胁，要做好“反修防修”，决定在城市也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作“四清”，叫做：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1962.9.）上，强调千万不能忘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实际上又掀起一场新的斗争高潮，要在城乡全面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刘少奇甩在了一边。1958—1960年折腾得大伤元气，又遭自然灾害遇了极端困难的中国老百姓，1961年刚刚缓和下来一年多，再次卷进了斗争的漩涡。

1964年开学不久，全院师生分批下到农村参加“四清”，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进行访贫、问苦，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农民的疾苦。我和一个班级的学生来到房山县南尚乐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里。这是一个平原地区的农村，主产是小麦，相对于山区这里应该是富足之乡。我们进村之后，师生混合着编组集体住在农民家里，轮流到农民家里吃派饭，每天和农民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用去专门地“访贫问苦”，农民会自然的给你讲很多，但是他们讲的那些，不是上面所希望的那样，让我们受到阶级教育，倒是反面的效果。他们诉说刚刚过去的困难和吃不饱之苦；诉说今不如昔，还不如解放前吃得好（因为这个地方原来很富裕）；诉说土改以后，由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到公社化，他们一次一次的变穷，吃的、穿的、用的都没有了，没有一点儿活钱；诉说挣得一点儿工分，不够付给分口粮的钱，农民多数都透支欠着队里的钱；诉说干部多吃多占，一茬换一茬，都是一个样儿。诉说解放前这里是拉锯的地方，今天是八路军、明天是国民党，来回地变，村干部们不管谁来他们都不受苦……。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越穷的越敢说，无所顾忌。

总之在农村受了一个月的“教育”，确实让我有很深的感触，让我真正地了解了点儿农村，了解了点儿农民，了解了不是报纸、广播、和大报告里所

说的那一套。首先，感到最为深刻的，解放后了十多年，农民还那样苦，不少农民住的还是破房烂屋，屋里空荡无物，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还有二十几岁的青年文盲。要知道，这是京郊农村，而且是南郊土地比较肥沃的平原地带，边远山区贫穷的更是可想而知。其二，公社化的目的似乎要把农民的私有观念全部化掉，但是人们更是斤斤计较得失，与干部争吵，干部说农民难管，自私自利，农民说干部多吃多占，不劳动；农民之间为一点小事打架、骂街，没有了过去邻里村民间的相互感情，没有亲属间的血缘亲情。其三，所谓集体劳动，敲钟后稀稀拉拉好半天到齐。我们干的多是耨地锄麦，干活的尽是妇女老人，干了一会儿地头休息，休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长。宣布歇工，妇女们赶紧忙着回家做饭，心在家里，出工不出力。其四，工分的计算，上面就规定下了，妇女只及男壮劳力的一半，干部是满工分，不用干累活，干部开会办事都算工分，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其五，村子里凡是大门楼高房子，不用问准是干部的房子，一般农民住的还是老房子，即使有新盖的也是低矮小房。贫富的差别不是贫农和地主富农，而是一般的农民和干部。过去地富的房子，远不及现在干部的房子。我感觉不到这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村里缺乏劳力，孩子多，有病人的家庭生活尤其困难，我们去访贫问苦，去不了最贫苦的农民家，他们管不起派饭，队里就不安排上这样的家里去。我们反而避开了这样最穷苦农户的“访贫问苦”。

我们在每家吃派饭，感到特别为难，我们只给半斤粮票三毛钱，农民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炒鸡蛋，吃细粮，由家里的男主人陪你吃，妇女忙着，小孩儿拿眼盯着你吃。你能忍着心吃得下去吗？我们大窝蜂的跑到农村，是去帮助农民还是去给农民增加负担？我们确实在受教育，教育使我明白，为什么那些决策者，不能为农民多做一些实事，提高农民的生活，而总在那里折腾农民。建国十几年让农民还感到今不如昔，不是农村工作的一大失误吗？这就是我在农村“四清”时所受到的教育。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不是说人民公社好，不是说社会主义使人民生活提高，而是普通的农民都在怀旧，怀念过去。农民生活苦难到难以想象。

在这个农村里，还看到了唯一一个“地主分子”，那是一个穿着又脏又破的孤老头子，在村里被派掏厕所，拉粪车的工作。他一个人迟缓蹒跚吃力地干着。看着他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可怜？同情？还是觉得过分？农民说他很老实，不吭

不声的干自己的活。没搞“社教”之前，农民对他还挺好，队里派他做的也不是重活。逢年过节给人家写一些楹联对子，他是一个老文化人，写了一手好书法，我在不少的农民家里，看到他写的中堂，挂在堂屋正中的条案之上。在两家看到的，写的都是西晋李密的《陈情表》，我记得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字眼。因为他是整大段的抄录《陈情表》。农民也看不出什么意思，当时我觉得这里有问题，象是一种哀鸣，象是哭诉。但是我对谁也没有说，只是记在心里。后来我回校查了《古文观止》里的全文，文中诉说的是祖母又老又病，可怜兮兮。李密陈请皇帝恩准他回家伺候他的老祖母。在《古文观止》里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而这个“地主分子”不抄录表达忠心护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出师表》，不抄录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辞藻华丽的《滕王阁序》，不抄录憧憬美好世界的《桃花源记》，不抄录表达崇高思想境界“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而抄录了有这么苦难凄惨描述的一段《陈情表》。这个“老地主”分明是在比喻自己，不仅是哀鸣、乞怜，还透露出愤懑不满。我当时思想一闪，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但是有什么必要去发难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糟老头子。可能就是一种人性的同情和可怜，我没有言语，没有声张，没有表现出“邀功”的“阶级觉悟”。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做对了，如果我把他揭发出来，或是报告他隐藏的意图，那他就一定成了地主分子翻案和对抗改造的典型，非被整死不可。我说出来，我则会被认为阶级警惕性高，受到表扬，还表明我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觉悟。但是我只把这个当作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非置人死地，装作没看到吞下肚子了。这也算是我参加“社教”运动所得到的又一个“教育”效果，居然同情和保护起一个老“地主分子”。天呀！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我反而是在起着如此的反作用，激起我的人性，激起我丧失“立场”的善心，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为了大学生们和老师们，到农村去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停掉一个月的正规教学。为了“反修防修”，遵照中央统一部署，地质部的所有地质队也进行“四清”运动。1965年秋季学院的马杏垣副院长被委任西北“四清工作团”总团团团长。我们探工系四、五两个年级加上全系的多半教师，政治辅导员，又是停课半年，参加地质系统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这确实体现了政治是第一位的，

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我是参加到，去甘肃省 604 地质队的“四清工作队”，地点在甘肃酒泉。地质部安排有专款，我们系师生几百人，连学生都可乘坐火车卧铺，开赴甘肃西部酒泉好几个地质单位。这回我们不止是学习受教育，而是做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四清”工作，说直白了这回是派去整人的。地质部（其他省部级单位也一样），贯彻中央指示，不惜血本，不顾正常工作，劳民伤财，要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

我们到了 604 队，领到了工作服、皮工作鞋，立刻进入祁连山，参加钻机的生产劳动。十月份的山上已经十分寒冷，我们住进了用煤取暖的棉帐篷里。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供水要不停地往上泵，水管才能不被冻住，钻探需要赶紧结束，天气太冷无法作业。停工收队回到酒泉基地，往常是休整、学习，然后工人放假。而那年则要在此间歇，进行“四清”，工人们也都不能休假，全部要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在山上待有二十多天，除了需要检修的设备运到山下队部，其余的全部留在山上，也不用人看管。机长说，没有人上来，什么东西也丢不了。从山上到山脚垂直高度大约 1000 米，空手上山、下山都需要两个小时，物资和设备都是靠索道运上运下的。山上海拔 4000 米，冬天不会有人上去，东西当然丢不了。

我们回到了酒泉基地，很快召开了全队“四清”运动的动员大会，由工作队队长宣布运动的进行程序，纪律要求和政策交底。先是发动群众，全体职工揭盖子、找问题，同时学文件，提高认识；再是帮助干部洗手、洗澡，干部自己抖包袱、倒豆子、自我检查；三是，干部和群众见面，听取群众意见，向群众检查，求得群众谅解、通过；四是，下楼落地，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五是，对阶级敌人、坏分子、右派分子要揭发批判，斗争示众。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最后是，全体职工群众通过学习讨论提高觉悟，提高阶级斗争的意识，把革命的热情转化为工作的干劲。

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反修防修”，不发生帝国主义所幻想的“和平演变”，不屈服沦为苏联修正主义的附属，防止亡党亡国；批判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杜绝腐化堕落，防患于未然，使共产党员保持革命本色，使共产党永不变色；要以政治统帅一切，带动全体职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是果真能那样达到毛泽东想要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吗？第一，毛泽东想通过运动，达到全党步调一致，但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好象并不一致，以至于毛

怀疑至少刘少奇就是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样的运动他不满足；第二，不抓经济空喊口号，一味劳民伤财使国家愈来愈穷，使人民愈来愈苦，人民没有积极性，工作效率不高，他则认为突出政治还不够；第三，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断绝不了腐败，但是毛泽东认为应该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从政治到经济一起铲除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复辟。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在他的心中酝酿着。

“四清”运动开始，我们下到油井机台的工人里、队部机关的科室里与他们座谈，听取意见。每天学生（工作队员），整理记录，然后分别列出给每个干部的意见（包括揭发），可以给本人看的，还要抄出来交给本人，我则是做文案工作写出每天的《简报》，上交给“四清”总队队部，汇报工作的进展。毕竟我们是大学生和大学老师，做这些工作是毫不费力的，还有做政工工作的政治辅导员带领学生，整理记录、汇总分类都做得很快很好。我们工作分队队长不是学校的，是甘肃地质局物探队的领导，他就感觉到在这里领导很轻松，不需要怎么交代一切都做得满意。比他在原单位工作顺手得很多。

在604队的“四清”工作中，我扮演了一个很可笑又无奈的角色。先是帮助分队长，一个钻工出身的基层领导，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讲也不会说，粗鲁直爆脾气，检查过不了关，要我帮助他写检查。我就是耐心地一句话、一个字的帮助他，让他用最通俗的语言，最诚恳语气表达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联系他的苦难家史，和自己的受苦经历，诉说自己忘了本，不应该随意和自己的战友、阶级兄弟，发火发脾气。他还真是声泪俱下地动了真情，讲得很实在。我帮他写的，不是照抄陈词滥调的政治套话，和干瘪扣帽子的检查，而是启发他，让他认识自己既然是当了干部，就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这样他可以脱掉稿子，用他的内心去讲，能够真情流露。他检查的效果非常好，令人感动。他也非常感谢我，使他一下过关。本来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工人师傅那是很习惯地，骂骂咧咧对待他带出来的徒弟，对待下面的工人。非要搞这种人人过关的检查，我觉得应该帮助他，不要让他那样受罪，“下楼”就赶快下来吧。我觉得他虽然这回检查过关了，也真有“悔悟”，我相信以后他还会照样发火发脾气，因为在钻探的现场，见到违规的操作，见到违反安全的地方，特别是见到事故苗头，必然当场立即发火，容不得慢条斯理地讲道理。所以那种检查

过关，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纯粹是瞎折腾人。

轮到了604队大队的队长兼党委书记，他的检查在队党委会上就没有过关，然后还要在全队大会上向全队职工做检查。工作队队长又指定我帮帮他，这就让我有点儿犯难了。他不是没有水平，也不是文化很低。我了解了一下，也还是一个工作很不错的领导，有一定工作能力，也有威信，就是不很平易近人，官架子比较大。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儿，两次三次检查也能过去。但是正赶上春节即将到来，“四清”工作必须要做到一个阶段，酌情收尾，春节后要开始做出队生产的准备工作。工作队队长要我一定帮他写好检查，一次过关，腾出手来抓工作。其他工作队员这时都已放假回家了，我留下来授命于紧急关头。我直接接触了这个队长，看了他写的检查，主要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干巴巴，罗列一条一条，不像检查倒像报告。另外也不突出重点，平铺直叙，还不恰当地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干脆我也不跟他讨论商量，就在他原稿基础上，修改润色。我看他也是不愿再下功夫，任我给他修改。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种检查显得无奈，也是根本不上心，我也正是乐得赶紧帮他弄完，“下楼”落地，好交差放假回京。

首先，我按他写的，摆出一些主要的工作上的缺点，对照第一把手的要求来检查自己，严格寻找差距；第二。抓住“突出政治”的纲，说自己未能用政治统帅业务，工作中主次不分，大事小事一把抓；再有，我帮他有血有肉的讲述自己的工作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但又表示做得不够，还要进一步提高；最后，还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教育，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带领好队伍做出新的成绩，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地质勘探任务。当然这讲的都是套话，迎合当时的潮流，但是我帮他润色，用真情的语言，让他表达得很恳切，很谦虚。但也不贬低自己，自我批评恰到好处。就这样，这位队长原封不动地照我写的讲，他讲的也很好，很自然，不像念稿子，更不是做报告了，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得到通过。他对我也说了一些客气和感谢的话，因为我毕竟不是他们队上的职工，更不是专职秘书，官面上的感谢话总是要说的。我总算完成了任务，赶紧启程回北京。过年的前两天上的火车，初一早晨到北京，年三十在车上过的，餐车还给包了饺子。

下火车，我穿着队上发的皮大衣、大头毛皮鞋，戴着皮帽子，看着是地地道道从大西北来的，直接去了城里我的家，进门让家里人吃了一惊。在北京休假

大约十几天，又匆匆忙忙赶回酒泉了。

回去后，接下的就是“四清”收尾工作。忙着和队上的职工座谈，征求意见，忙着写总结，忙着归还从队上借的物品。对我来说还干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就是给我们的“四清”工作队长，写一篇他给地质队的全体党员上党课的讲稿。这真是很滑稽，我连党员都不是，我有什么资格来写党课讲稿。这位队长是一个当兵的出身，甘肃另一个地质队的队长，文化水平不高，让他正式的给别人上一堂党课，也真是有点儿难为他。他让我帮他，我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我问他想讲什么内容，他说就讲一下，怎样做一个好党员。我说我给你写出一个详细的大纲，你照着那个用自己的话讲，不要念稿子。我想，他当了多年的领导，大会上讲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要讲讲党课，缺乏条理性、逻辑性，这是我们当老师的专长。我不记得给他写的什么了，总之我看了看党章，按着我应该怎样做一个好党员，起草了一个详细的大纲，至于他怎么讲的我不知道了。事后他告诉我，他讲完反映很好，听那个口气，是基本按我给他拟的那个提纲讲的。从这里也就可以想到，一般单位里的党课教育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道理谁都会讲的。

“四清”工作结束，“四清”工作队解散，工作队员各回各的原单位，我们学生们也都返回学校上课。搞了这么一个“四清”，学生们几乎一个学期没上课，这就是所谓的为了“反修防修”。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什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一个上级指令就可以任意缩减或者取消。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随意停学、停课，这种不正常不就是在按某一个人的意志行事吗？

在参加了两个“四清”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后，我确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总结了一下这种“教育”有五点：

一．强力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谓突出政治，首要的就是要求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保持着对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革命政权的警惕性。看待任何社会现象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任何人和事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任何言行要以什么阶级立场去衡量。一句话，就是要练就每个人都成为六亲不认的“革命人”，只有阶级情，不要“人性论”。

二．彻底树立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一个行动”的准则，任何不遵循这个准则的人，就是偏离轨道，就是离心叛道，就要受到批判。当然对这个准则，从来不能这样明着说，但是却这样做，贯彻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

我小时候记得，这是“蒋委员长”的训令，查其根源，好像是从希特勒那里移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怎么会有这个呢？

三．必须与毛主席的党中央保持一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能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仅是不同意见，绝非不同政见，那也不行），更不能有反对的声音，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轻者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者就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按照后来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就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歌功颂德，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就能高升、腾达。

四．我不会天真地相信通过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就能提高人民的觉悟，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不再相信我们的生活幸福美满，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的人还在受苦受难，我们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谎言；不能糊里糊涂，盲目地跟风跑，充当左先锋。这一点，很遗憾，我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卷入到政治漩涡里；再不会“完全”“彻底”地向组织交心，暴露自己的不解和怀疑，事实是多少人因此带来灭顶之灾。

五．我通过参加“四清”，看清了不论搞什么政治运动，都不能解决什么防止“变修”，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变质”声势浩大的运动，能暂时地吓唬住在利益和色诱面前意志薄弱的官员，但是因为缺乏完备的法律制度，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一有机会，他们早忘了廉洁、奉公的准则。共产党的官员从来就没有断过腐败，什么政治教育，什么党校学习，总是刹不住某些有权而缺乏监督的当官者的贪婪的欲望。

以上就是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受“教育”的心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贯彻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完全是一个劳民伤财的折腾。晚年的毛泽东时刻担心大权旁落，害怕身边的赫鲁晓夫，害怕他身后不能继续执行他的路线，一个劲地要扫清一切障碍，为他的“接班人”铺平道路。所以他不满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就是他晚年讲的，他一生里所完成的两个伟业之一。■

【文摘】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北京市文艺界学习运动进入思想检查阶段

北京市文艺界各单位整风学习已进入思想检查阶段。有些单位的检查比较深入，也有些单位在检查时流于形式，没有很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有些同志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有思想顾虑，担心“降低威信”，或者“失去领导方面的信任”，错误地认为“如果公开检讨，自己就没脸再干下去啦”。

事实证明，这些顾虑完全是不必要的，错误的，必然阻碍自己纠正错误的。凡是公开深刻检讨了自己错误和缺点的同志，不仅没有降低自己威信，相反地，由于他的坦白和诚恳，由于他的正确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周围的同志和群众，莫不增强了对他的拥护和爱戴。另一种做法，却造成了相反的结果。凡是在检讨时表现了不老实，为自己的错误采取辩护的态度的人们，大家对他就一致不满，认为：“他不是走自我改造的道路，而是走死亡的道路！”这样的人必然丧失“威信”和“信任”。

在中央音乐学院和音乐工作团的学习中，发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有些教员轻视政治，错误地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有些人口头上承认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却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企图为自己寻找理由，认为“可以来个分工”，有些作曲者具有“成名”“成家”的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心想创作“保留节目”（不受时间性限制的作品），拒绝和人民的斗争结合，抽象地追求技术上的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思想，把普及和提高只单纯地看成是一个技术的高低问题，这些错误思想正在继续被批判中。

人民美术出版社检查下列几个重点：（一）纠正脱离政治倾向；（二）克服单纯技术观点，反对粗制滥造；（三）解决个人艺术创作和革命事业的关系问题，克服不安心作行政和编辑工作的态度，纠正行政工作上的事务主义，加强思想领导；（四）批判自由主义作风。

中国戏曲研究院批判下列几种思想：（一）反历史主义观点；（二）单纯技术观点，如京派思想，形式主义等；（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包括低级趣味等。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文艺处检查下列各重点：（一）领导方面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二）创作中的粗制滥造作风；（三）通俗文艺创作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思想，投降旧形式的倾向。个别作者有严重的“小圈子”主义，认为“小圈子”以外的文艺界如果不承认自己，自己也就不承认他们。认为粗制滥造是合法合理的，主张“有稿即编”，“以量胜质”。■

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1月3日第三版

【文 摘】

山东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思想改造学习

山东省学校教师在山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的帮助和领导下，已在1951年11月下旬开始进行有系统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为了统一领导这一运动，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会）已成立，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厅长王哲任主任委员，文教厅副厅长王统照、刘健飞任副主任委员。参加这次学习的包括山东工学院、山东农学院、山东医学院、山东师范学院、山东会计专科学校及济南市私立齐鲁大学等六个专科以上学校教师和科长以上的工作人员共960人，学习时间预定到1952年暑假结束。

为了推动这一学习运动，使教师们进一步了解这一学习的目的，总学委会在去年11月24日特邀请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夏征农副部长作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启发报告。报告后，各校（院）领导方面吸收学校党的组织、工会、青年团负责人和教师代表组成学委分会，重新整理了教师学习小组。各小组均分别举行了座谈会，许多教师都表示决心在这次学习中改造自己。很多学习小组，还订立了学习公约。

根据一个月来的学习情况看，通过听报告、学习档、漫谈和小组讨论等，教师们对于学习，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齐鲁大学医学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尤家骏说：“我虽然是快60岁的人了，但也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只有改造了旧的思想作风，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各校教师在学习中已开始联系本校工作及个人的思想，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就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整个情况看来，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有些教师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存在着不少顾虑，如对于学校各级领导人员，不能大胆地提出意见。因此，各校领导同志必须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及个人的思想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进而在全任教师中展开全面的、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当前推进学习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山东农学院华山副院长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学校工作各方面的缺点，进行了揭发，其他各校（院）负责同志也正准备以身作则，来推动全体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以达到改造思想和改革教育的目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1月3日第三版

【文摘】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委会 举行自我改造学习动员大会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自我改造学习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主任杨明轩、副主任张稼夫等和西安附近六个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学生代表等一千三百多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等机关也派代表参加。

大会邀请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作了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张治中指出，西北各高等学校教职员两年来经过初步自我教育，在政治上、思想上已有了某些进步，这些进步使这次自我改造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他在说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以后，对目前西北区各高等学校教职

员中相当普遍存在的单纯技术观点、雇佣观点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等不良倾向，作了分析和批判。他指出，有些教师在工作中对人民和国家利益不加考虑，处处从个人地位、名誉、待遇着想。他说：“这些落后的思想意识是和今天新中国的建设需要背道而驰的。每一个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教师，必须认清自己负有培养国家优秀的建设人才的神圣责任，自觉地起来和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进行斗争。”他着重指出，有些教师现在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和买办思想；个别教师甚至由于这种反动思想的发展，已失去了人民立场。这种思想是目前高等学校改革工作的主要阻力，我们一定要坚决把它肃清。张治中并以他的思想改造的经验说明：站定立场、分清敌我、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勇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学习的关键。他还批判了有些教职员在以往政治学习中的冷热病和抗拒批评的不正确的学习态度。他希望各高等学校教职员能够在团结互助的基础上，认真地进行自觉的自我改造工作。

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江隆基在会上发言。他说明这次学习以达到逐步确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和进一步改革高等学校为目的；要求各校教职员打消各种顾虑，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保证学习顺利进行。（新华社）■

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1月13日第三版

【资料】

北京师大女附中 17 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

《解放》、《肯登攀》、《众志成城》、《放眼量》

大事记编写小组

前言

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组成部分。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一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攻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建国 17 年来，我国教育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复杂、曲折和激烈的。

由于旧中宣部、旧教育部、旧北京市委一直把师大女附中视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点学校，这一斗争在女附中的反映同样是非常复杂、曲折和激烈的。

为了全校革命师生在一起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真正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教育大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为了使同志们对我校 17 年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况有一个简略的了解，以便进一步揭发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女附中的罪行，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为了有利于我校的斗、批、改，我们编写了这份《北京师大女附中 17 年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

这个大事记，是由《解放》、《肯登攀》、《众志成城》和东方红《放眼量》等战斗队（组）的部分同志联合组成的“大事记”编写小组写成的。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又因我们人少力薄，大多数同志是最近几年来校的，了解情况不多，很可能有观点错误或重要遗漏，希望得到广大革命师生的帮助、补充和指正。

1967 年 6 月

人民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时期

1949年——1952年

1949至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同时积极恢复工农业生产，医治好战争的创伤，为转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作了准备。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陆续接管了大、中、小学，收回了教育主权，新中国的教育向何处去？毛主席提出“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法”，应“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取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经验，建设新教育。”但刘少奇、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完全否定了老解放区的经验，极力维护旧的教育制度，并整套搬用苏修的教育制度来抗拒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这样，从解放初期，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开始了。

领导干部情况：

彭文：49年任校长、总支书记，50年调往天津；

苏灵扬：50年来校任副校长，彭文走后升为校长、总支部书记；

刘模：校长办公室主任，五二年调往教育部；

丁丁：任教导主任；

胡志涛：副教导主任；

卞仲耘：副教导主任；

王友石：总务主任；

李天义：副总务主任，52年升为正总务主任。

1949年

一，1949年5月9日，老解放区晋察冀育才中学女生部、原国立北京师大女附中、私立文华女中合并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彭文任校长。

二，师大女附中根据主席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一) 大抓政治改革

- 1、公开地下党组织，建立党总支；
- 2、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师大女附中总支；
- 3、取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动机构训育处等，建立教导处、校长办公室；
- 4、取缔反动党团组织；
- 5、成立学生会；
- 6、建立人教联和工友工会。

(二) 大抓知识分子队伍的改造

- 1、清除一批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送华北大学改造；
- 2、1949年暑假组织教师学习会，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

(三) 大抓建立革命新秩序

(四) 发扬了老解放区教育的光荣传统，在校内校外建立了劳动基地，师生定期分班去劳动，并开展劳动建校。

(五) 开设政治课

(六) 发扬民主教学，提倡学生给教师提意见，在学生中培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期末民主评定学生操行。

1950年——1951年

一，土地改革运动。我校教师15人，去某地参加土改，学生组成文艺演出队，和用星期日假日到北京郊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二，1950年12月21日，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少先队的上身）。

三，广大革命师生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

(一) 美帝发动侵朝战争，我校90%以上师生报名参军。

(二) 批判师生中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蔑美、鄙美、仇美思想。

(三) 广大师生参加街头宣传，有些同学甚至到门头沟斋堂等山区去演出，大肆宣传美帝在朝鲜的血腥罪行，激发群众对美帝的仇恨。

(四) 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捐献慰问志愿军等活动。同学们做慰问袋、写慰问信，与志愿军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如我校同学与杨连弟关系非常

密切，杨连弟同志牺牲后，连里战士把英雄的画像遗物赠给我校，鼓励同学们向英雄学习。志愿军回国，也常来我校作报告，对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四，学校向工农开门，1951年我校开始在工矿子弟中招收保送生，开设工农子弟班。

五，刚刚新生的女附中，旧社会的残余还没有来得及清除，修正主义的黑手又伸进来了。

（一）解放后第一次整风，大学“黑修养”，把党员引向脱离实际阶级斗争的歧途。

（二）并校一周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出席了我校校庆大会。

（三）毛主席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1951年3月，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等歪曲主席指示，只提“健康第一”，不提“学习第二”。我校校长兼总支书记苏灵扬偷梁换柱，借抓学生健康，关心生活为名，大搞干部子弟特殊化。如当时公费生和自费生分两个食堂用膳，公费生每月伙食9.5元，自费生每月伙食费7.5元；公费生与自费生住宿舍，公费生每个寝室床单，都强调颜色、花布一致，每人发上衣一件、箱子一个、毛巾被一条；公费生宿舍环境卫生等，□□□（按：此处缺第7页——整理者）新课，巩固新知识，布置作业）被普遍推广。

五，突击“智育第一”，我校开始颁发学习优良奖章。

六，1952年，旧市委旧市教育局勒令取消学校劳动基地，我校执行了这一决定，并且把民主评定学生操行改为由班主任征求意见后进行评定，丢掉了解放区民主办学的经验。

七，华北中学并入师大女附中。

八，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布试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开始搬用苏联中小学教学计划和部分学科教材。

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确定时期

1953年——1957年

1952年底，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开展了全民的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教育战线上，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复辟资本主义提出了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大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极力抵制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反对教育革命。

是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中国自己的路，还是照搬苏修的一套，这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

领导干部情况

苏灵扬：总支书记兼校长，55年调往教育行政学院；

丁 丁：53年由教导主任提升为副校长，54年调往中央教育部；

胡志涛：53年提升为教导主任，54年提升为副校长，55年兼任党总支书记；

卞仲耘：副教导主任，50年提升为正教导主任，56年总支书记兼教导主任；

李天义：总务主任；

刘志平：副教导主任。

1953年——1956年

一，大学苏联

毛主席早在1949年就提出：“新中国的教育，应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取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的经验为基础，办“抗大”式的学校，这就是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

但是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改革旧教育的正确方针，主张全盘的搬苏联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提出我国的教育要“全盘苏化”，“先搬后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林枫、董纯才、钱俊瑞等忠实执行刘少奇的黑指示，极力鼓吹教育要全盘学苏联，极力抵制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顽固地阻挠根本改革旧教育。

此期间，我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教学工作、班团队的活动、教学设备、管理制度、全部搬用苏修的一套，学习苏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 教学方面：凯洛夫教育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凯洛夫教育学的核心是使教学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脱离生产劳动，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校学习苏联，在教学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和做法：

1、自1952年起，数理化各科课本全部用苏联的课本。1952年7月教育部制定中学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全盘用了苏联中学的教育计划和有关教学大纲。

2、自1953年起，陆续取消了初一到高三各年级的政治课，仿效苏联开设宪法课。

3、突出智育第一，建立各种课外小组，举办课外小组成果展览，举行科学晚会，组织数学竞赛，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鼓励学生只钻研学习，不管政治，引导学生走只专不红的道路。

4、1953年起学生成绩评定由百分制改为五分制。

5、体育活动方面推行苏联的“劳卫制”。

6、1953年胡锦涛由教育工会组织去匈牙利参加国际教育工作会议，途中曾在苏联参观访问，回校后向全体教职员报告国外见闻以及苏联建设、教育发展情况。

7、自1954年起，北京市开始统考排队，在校内开始公布考分排列名次。

8、自1955年全市统一颁发学习优良奖章、金银质奖章。实行保送制度。金银质奖章获得者，可自由挑选学校，被保送升入自己理想的高中或大学。

9、1955年教育部派出“中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作用。我校教导主任白耀是代表团成员。回校后推行苏联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经验，在各年级实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开设实习课。这套做法实际上是抵制毛主席提出的劳动教育，阻挠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培养脱离实践、脱离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0、1956年开始取消英语课，各年级一律学俄语。

(二) 政治思想工作方面

1、以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品质教育代替阶级教育，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大讲特讲“性格与意志”的锻炼，大讲纪律、礼貌、文明行为、友谊和同志爱。

2、青年团、少先队、班级活动以智育为中心。

3、少先队每年暑假组织夏令营、萤火晚会，我校一学生曾去匈牙利参加夏

令营。

4、元旦各班举行化妆晚会，每个教室的中间摆上一棵五颜六色的“圣诞树”，让化妆的圣诞老人、春姑娘向大家祝贺新年。

5、共青团组织生活会上学习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

6、1955年3月8日全校召开英雄班命名大会，当时的高三1班，被命名为“卓雅班”，高三2班，被命名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班”，其他各班也开展了向英雄学习的活动，主要的是学习苏联的英雄。如马特洛索夫的话：“由于你的生存，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用大字写出贴在教室里。

（三）行政制度和教师工作

1、将党委集体负责制改为一长制，这样做的结果削弱了党在学校的领导。

2、对教师队伍不做阶级分析，重才轻德的倾向极为严重，如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唐某某、朱某某和曾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入狱的张洪涛及一些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而又未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都被当成是宝贵财富、精华、才子，倍加重用，这些人在57年有不少成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后被定为右派分子。

3、大力提倡并具体组织安排教育学习“凯洛夫教育学”。

4、引导教师走只专不红个人奋斗的道路，在教师队伍中实行业务挂帅，提倡定计划，鼓励考“副博士”，为了保证教师的业务进修，凡在函授大学进修的教师，都可以不做或少做社会工作，少参加政治活动，把业务摆到了“压倒了一切”的地位。

5、1954年，校长兼党总支书记苏灵扬，在长安戏院作报告，介绍□□□□（按：此处缺第12页——整理者）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教育的大杂烩，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十几年来用以对抗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总纲领。

（二）我校贯彻情况：“五四决定”出笼后，在我校得到忠实贯彻。

1、突出智育第一：学校全部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实行业务挂帅，分数挂帅。校领导规定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和教学大纲，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校领导建立了教学检查制度，教务处、总务处提出“一切为了教学”的口号，在同学中提倡全面发展，鼓励学生为全五分而奋斗。

2、大搞物质刺激：

“五四决定”规定以学生的学习成绩评定教师的工作和薪金，鼓吹物质刺激。

教研组长和班主任都有附加工资，编写教学参考资料也给报报酬，甚至给师大实习生讲观摩课、带实习班主任、作报告都给报酬。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代课金、超钟点费等名堂。这些做法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金钱挂帅有什么区别？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

3、重用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4年底，为了奖励贯彻“五四决定”有功的教师，由领导以业务为标准在教师中评奖。一等奖，1个人；二等奖15人。其中有些人有严重历史问题，反右时猖狂向党进攻，这些人在当时，却受到苏灵扬、胡志涛的赏识，倍加重用和吹捧，如唐某某、朱某某、林莽，都是当时红得发紫的人物，这些人反右时都是右派。

在教师中发展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在业务好即政治好的思想指导下，把一些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拉入党内。

4、取消工农子弟班：

我校忠实贯彻“五四决定”，实行分数挂帅，片面追求升学率，唯恐工农子弟的考分低，影响我校在北京市统考排列名次，于1955年取消了工农子弟班。这是与毛主席提出的“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的党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

三，1953年3月5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逝世，我校举行大会沉痛悼念斯大林同志。各班开展了纪念斯大林同志的活动。

四，1953年6月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对青年发出“三好”的伟大号召。会上，我校同学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献了花。

五，1954年，党内团内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高饶事件的决定”。

六，1955年取消公费生制度。

七，1955年我校脱离师大，直属中央教育部，改名为“北京实验中学”。

八，1955年我校开始“反胡风”学习，语文教师林莽（即陈洪涛）因是嫌疑分子被捕入狱。

九，1955年暑假，我校开展了伟大的肃反运动，对教职员工中6人进行审查或斗争。

十，1955年，中央教育部中学部彭文、丁丁视察北京市教育工作，对北京

市的教育工作提出批评说：进城以后，北京市的教育工作迎合了资产阶级。

十一，1955年，中央教育部颁布“中学生守则”，此守则曾被称为全国中学学习纪律和日常生活行动的准则。“守则”不谈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却为保证教学工作定出了种种束缚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清规戒律，是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黑货。

十二，1956年暑假，搞“定级调薪”，评薪时忽视本人的政治表现、工作态度，而单纯地片面地强调资历和业务能力，其实质是提倡业务挂帅，大搞物质刺激，加大了工资差别。

十三，1956年，教育行政学院来我校实习。

1957年

一，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年6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毛主席在这个伟大的著作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正确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英明论断，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个伟大著作中，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再次指明了方向。

二，1957年3月，毛主席发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指明了知识分子必须思想改造，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篇光辉著作，是指导我们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赤膊上阵，亲自出马抓教育工作。3月22日，刘少奇在长沙中学学生代表座谈会上，鼓吹学生升学走个人奋斗的

路，宣扬封建阶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货色。

4月8日，刘少奇授意杨尚昆将他的讲稿，交给《人民□□□□（按：此处缺第16页——整理者）反右斗争是解放后政治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成绩是伟大的，任何右派分子企图否定反右斗争，为自己翻案，都是痴心妄想。

经过反右斗争，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革命干劲大增，为58年的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做好了政治思想上的准备。

五，五七年暑假后，我校各年级恢复了政治课，对学生进行反右斗争教育。

六，刘亚楼与我校教师章某某乱搞男女关系，彭真包庇刘亚楼而对章进行种种迫害，胡志涛秉承彭真黑指示，于1957年11月将章某某开除出师大女附中。

七，我校高三学生王桂琴，利用寒假回乡参加生产，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日记中她写下了她遵照毛主席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体会与感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王桂琴同学的日记，并作了批示，对王桂琴同学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指示在同学中传看王桂琴同志的日记，向王桂琴同学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了我校师生极大鼓舞，后来王桂琴的日记，发表在“中国青年”上。

八，这一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教育大革命大发展大反复时期

1958年——1962年

1958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工农业及其它各项事业，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在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在文教战线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向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几千年来残存的旧教育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冲垮了土教条、洋教条，开辟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崭新的道路。1958年是毛主席教育思想大放光彩的一年，也是我

校教育革命蓬勃发展的一年。

1959年，毛主席发出“反右倾，鼓干劲”的伟大号召，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教育革命继续向前，文教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绝不容许任何阶级敌人抹杀。

1960年到1962年，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修的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的困难，帝、修、反大肆反华；国内以刘邓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配合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肆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大刮单干风、翻案风，妄想复辟资本主义。教育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刘邓支持下，疯狂攻击1958年以来的教育革命，陆定一抛出修正主义教育纲领《教学必须改革》，提出“四个适当”的口号，贩卖资产阶级“教学为主，智育第一”的黑货，攻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教育战线出现大反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击退了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一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校有了强烈的反映。

我校领导干部情况

胡志涛：58年暑假后，因“58事件”被旧北京市委打成“反党分子”，了组织处理，离校到工厂劳动。62年暑假后，撤销处分，回校任副校长。

孙岩：58年反革命事件的得力打手，58年11月从幼师调到我校任党总支书记兼校长。

卞仲耘：原任党总支书记兼校长，孙岩调来后，任总支副书记兼副校长。

刘致平：60年由教导主任提升为副校长。

李天义：：60年由总务主任提升为副校长。

汪玉冰：60年由副教导主任提升为正教导主任。

学校关系变化：60年实验中学改为师大女附中，行政关系由西城区转到北京师大。

1958年

一，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师生自觉地进行思想革命化，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初步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58年1月31日，毛主席在《工作方法60条》中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二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1958年5月，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资产阶级教授”和“插红旗，辩方向”的伟大号召。

（一）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吹响了革命的进军号，给了广大革命师生极大的鼓舞，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敢想、敢说、敢干，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给学校领导、教师教学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促使教学改革及教师思想改造。在同学的帮助促进下，不少教师向同学表决心，接受批评，有的还给自己贴了大字报，自我革命。这就是1958年轰轰烈烈的双反交心，两比扫五气运动（双反：反浪费，反保守；两比：比先进，比多快好省；扫五气：官、暮、骄、娇、怨气）。

（二）各年级同学，广泛地开展了红专大辩论，学生团员进行了整团，思想非常活跃。对团员中的中游思想、只专不红、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进行了批判。7月1日，纪念党的生日，康生同志来校做了“自觉革命，不断革命”的整团总结报告，对师生教育很大。不少师生在大跃进形势鼓舞下，纷纷定了跃进计划，高标准要求自己，虽然有些指标缺乏科学分析，不够实事求是，但这是前进中的缺点。

（三）五八年暑假，教师团支部进行整团，针对教师团员在红专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思想及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等等，进行了辩论、批判，不少（ ）思想很活跃，也能做较深刻的自我检查。但到了整团后期，旧《北京日报》发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动的“驯服工具论”，旧团区委马上要求教师团学习讨论，结果（ ）自觉革命的整团转移了方向，用黑修养毒害了团员，影响极为恶劣。

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8年1月31日，毛主席在《工作方法60条》中对教育革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时指示：“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

学校，老师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批判了教育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和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

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我校广大师生也掀起了一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高潮。不少师生下乡拜工农为师，虚心向工农学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搞了一些小工厂，如酒精厂、硫酸厂等。但旧市委要借口原料供应困难，破坏教育大革命，致使工厂不能投入生产。在东楼后有农业劳动园地，师生员工大搞深翻土地，种了蔬菜、小麦等。暑假开学后，高中同学和老师满怀激情，到顺义深翻土地，进行劳动锻炼。校内劳动已发展到采取与附近工厂挂钩，订立劳动合同的办法，如到西城低压电器厂、强生电器厂、广播事业局等工厂劳动。后来广播事业局的部分车间迁入我校，同学分班参加劳动。全校师生意气风发，干劲十足，掀起教育大革命的热潮。

入冬后，广大师生员工，又投入了伟大运动——大炼钢铁。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找原料，建土炼钢炉，为增产钢1070万吨而奋斗。

广大师生，为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冲破了课堂教学的框框，写诗做歌，诗歌满墙，歌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

教育革命出现以前未有的崭新的局面。

三，旧市委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教育战线上大搞阴谋破坏活动，对抗毛主席教育方针。

（一）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怕的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想把1958年教育大革命扼杀在摇篮中，以维护修正主义统治。1958年5月，北京市教育局要各校试行《北京市中学生学业成绩考查暂行办法》，《北京市中学生操行成绩评定暂行办法》，用修正主义的名利为钓饵把学生完全束缚在课堂上，读死书，死读书，用物质、荣誉等手段，刺激学生为分数拼命。我校忠实贯彻了上述文件，对我校广大师生毒害极深，影响极坏，把学生引向成名成家的歧途。很多学生为追求金银质奖章、保送等，拼命读书、做题，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抵制破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

贯彻，拼命控制基层领导干部，并为它服务。1958年8月以讨论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名，强迫干部对54年《北京市委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纲领表态，当有些干部，对“五四决定”提出意见时，旧市委、旧区委对这些干部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和斗争。我校副校长胡志涛等对“五四决定”提出了意见，遭到围攻和斗争，并给予党内及行政处分，这是旧市委在教育战线上搞的一次规模很大的反革命事件。

1959年——1960年

一，搞“教学为主，智育第一”，把教育大革命拉向右转。

（一）60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把黑手直接伸入我校，为我校题词“同学们，应当立大志，攀高峰，这不只是为了个人，而首先是为了大家，为了社会。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看成是自己个人的私有财产，还是把它看成是社会公有财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之一。”校领导把它视为“圣经”，捧为“至宝”，专门拍照，放大立匾，制作书签，赠送给三好学生，大肆宣扬，向青少年灌输成名成家思想，引导青少年走向白专道路。

（二）60年4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提出“四个适当”（即适当提高程度、适当缩短年限、适当减少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口号，贩卖“教学为主，智育第一”的黑货。59年7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文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教育“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性的基本任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提出“教育的根本的问题，是让学生稳定地读好书，教师稳定地教好书”，我校领导忠实地贯彻了这些黑货指示。

1、59年9月，组织学生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与决议，广大同学群情激昂，而校领导却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提高学习质量”的口号，要求学生要“听课好，作业好，复习好”，大抓“刻苦、踏实、细致”的学习风气，改进学习方法，加强组织性教育等。

60年11月，组织学生学习教育方针。广大同学热情高涨，暴露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纷纷要求通过组织集体活动解决这些问题，而校领导却提出“学习教育方针干劲落实，提高学习质量”的口号，要求同学“勤学苦练，牢固掌握知

识”。就这样把同学们充沛的革命热情引向走白专道路。

2、大力开展科技活动。学校组织了超声波、无线电、原子能、半导体等小组，而对毛著学习小组却一再强调自愿，而不去积极组织学生掌握毛泽东思想。

组织花样繁多的比赛活动，书法比赛、作文比赛、数学比赛等等。训练学生“能写会算”“能说会道”的本领。

3、组织教师参观学习景山学校大搞“智育第一”的经验。孙岩勒令语文组老师和景山学校语文老师成立互助组，经常去景山学校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童大林的报告，听他们请的资产阶级权威俞平伯、冯至、吕叔湘等的报告，学习景山学校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和教学措施。还让我校同学读古文背古文（如李密的《陈情表》等）。

（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国梁扬言“高三毕业成绩，是中小学十二年质量的总检阅”，并说“要用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十四分干劲，来赶福建、超福建”。我校忠实贯彻“抓高三，带全面”的口号，使全校工作都以高考指挥棒来转移。

1、怕高考出丑，就要求其他各年级都相应加强“阵线”，于是许多作业难题、灵活题，纷纷下放到其他各年级，甚至于增加教材难度，扩大范围，以致造成各年级学生学习负担加重，严重影响健康。

2、旧市委、区委以学生为敌人，采取突然袭击，进行各年级统考。教师就把学生当作争分工具。各科教师为了提高本学科的成绩，不得不采用小测验、单元考，考完还要给学生依成绩好坏分类排队，要求学生分析试卷，订提高成绩的计划等等手段，来压学生。

二，大肆推行“抓高三，赶福建”

1959年度高考我校列为北京第一名，孙岩大肆宣扬，并公开说“我就敢拿第一名”

1959年全国高考福建省分数第一，旧市委派专人去福建参观。学习“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回来后，向北京市中学施加压力，在中小学领导干部会上公开宣传高考成绩的名次。

1960年旧市委疯狂追求升学率，继续大刮大抓毕业班的黑风。旧区委为了让西城区能在北京高考排第一，把全区中小学，分为一、二、三线，我校列为一

线的重点校，为高考争分打先锋。孙岩亲自抓高三毕业班，不仅忠实贯彻旧市委区委一切黑指示，并有创造发明。

（一）精心配备人力，由校长、教导主任各一人抓高三毕业班，把所谓业务好的教师、“追分能手”、“押题能手”齐集高三把关。为了帮学生填写高考志愿，使学生都能考上大学，班主任都是精心挑选。

（二）全校工作提出“抓高三带全面”，“给毕业班让路”，要求老师“教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个学生”，“学习钻研高考大纲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总复习大纲”，油印大量复习题和复习讲义。

（三）老师为了给本学科争分，互相争地盘，抢时间，有的借到班辅导为名，使自习变为变相讲课。

（四）高三毕业班班主任，以开学起就抓学生志愿，进行所谓的辅导，实际是以高考为口径，更改学生的志愿。到了填写高考志愿表时，则班主任根据多年积累押宝式的“填表经验”进行辅导，师生精神十分紧张，简直成了考验高三班主任的关键时刻。

（五）旧市委经常对高三班学生进行统考，各科教师不得不用小测验、单元考、书面作业评分等等办法来压学生。因此形成市区压学校，学校压教师，教师压学生，对学生疲劳轰炸，严重影响健康。有9名应届毕业生患肺病，至于近视眼、神经衰弱更急剧增加。

（六）旧市委对学校提出要求：“成绩要提高，但体重不能减轻”。学校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极力想各种办法处处对高三特殊照顾。为提高学习成绩，就让高三全部住校；为了不减轻体重，每天喝牛奶，一天吃四餐；学校瞒报余粮，把库存肉罐头吃完；到外边听报告，怕学生消耗体力，专车来回接送；学生每周量体重一次。

（七）为了让学生专心致志读书，培养修苗，减少政治活动，劳动移到高考后进行，高三同学一律不能担任全校性社会工作，团的活动不受团委会统一安排，不参加全校性大扫除。

（八）搞所谓的“临场教育”，高考前一天不温课，专门教给学生答题方法，嘱咐得无微不至。高考时，学校有专人把汽水、酸梅汤等送往考场，唯恐给女附中丢了所谓名牌的“荣誉”。

三，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做了几十年的教师、校长，终身办教育，这就是荣誉。能办好学校，教好学生，就是专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文松攻击党不善于发动所有老教师的积极性，不善于用人，鼓吹现在阶级斗争已经缓和下来，应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

孙岩马上积极配合，公开宣扬“老教师是教师中的骨干，是办好学校必须依靠的力量”，又说“女附中牌子硬，不就是因为有几个老教师吗？”

为了更得力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肆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树立业务挂帅的“旗帜”、“标兵”，我校系旧市委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点学校，具体做法如下：

（一）1959年底，旧市委“奖励”为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功的个人，我校20余人由校领导指定为区先进工作者，均系三级以上教师（教师最低一级是十级）。这些教师，许多是“追分和把关能手”，是旧市委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社会基础，他们当选了区先进工作者，还被邀请到北京饭店大吃大喝一番。

1960年3月，旧北京市委又召开所谓全市高教系统“群英会”，对积极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单位和个人大加奖励。我校因升学率高，被树为“市红旗单位”，由校领导提出十几名教师为“市先进工作者”，参加市中小学“群英会”，数学组被命名为先进集体，其中女同志为“三八红旗集体”。一位老教师一年时间内，被提名为区先进工作者、市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群英会代表。

（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名教师”给予种种较高的政治待遇，全国人民代表、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和接待外宾、出席国宴、参加“五一”、“十一”天安门观礼等活动。

（三）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干将安子文主张在“名教师”、“名专家”、“名演员”中吸收一批党员，说这样“影响大”，“震动大”。旧区委积极贯彻执行这一黑指示，我校也忠实执行这一条修正主义建党路线。1959年，用突击形式把两位老教师发展入党，在发展会上，校领导大肆宣扬她们“30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有的党员对她们提工农感情不够的意见，校领导都不让提。因为她们工资高，入党后马上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听到县团级以上党内干部报告，

而38年入党的老同志，由于工资不够标准，都不能听到。

（四）59年旧区委为了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宗接代，培养修苗，大搞“师傅带徒弟”，传授“经验”。我校积极配合，大搞拜师会，老教师带徒弟，订立“师徒合同”，教师团支部还行拜师大礼，给师傅佩戴大红花等。59——60年，为了培养修苗，把59年高中应届毕业生中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本人政治上也不怎么进步的，但学习成绩优秀，未考上大学的，旧区教育局留了一批专门培训作中学教师。我校当时留下十余人，专给老教师配备为“助教”，组织老教师给青年教师写大字，讲古文。

（五）旧区委为了培养高薪阶层，就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喊冤诉苦，为他们争名利，企图把特级教师提拔为副教授级，工资由177元提到261.5元，便从我校几个老教师的工资情况进行调查，认为少数老教师的工资仍低于抗战以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安子文曾让我校领导汇报老教师工资情况时说：“你们学校老教师工资太低。”陆定一也说：“搞一批提薪水，可以100元、200元。”这就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培养高薪阶层，不惜对新社会恶毒的进攻，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我校曾在旧区委指示下，为几个老教师填表，大写“功勋”，准备破格提她们的工资由177元为261.5元，授予教育专家头衔。

（六）59年校领导为拉拢老教师，把一些老教师集中在一个院住，规定男同志和有小孩儿的同志不准住等清规戒律，形成生活上也特殊。

（七）60年7月份旧市委召开“老教师”座谈会，对他们资产阶级教学经验，大肆吹捧，并要求回校后每人要总结经验，会后西瓜、汽水、点心、糖果招待。我校也推荐“老教师”积极参加。

（八）60年11月份，旧市委布置在教师中搞一次小规模的特级。旧区委趁机大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位一级教师提为特级教师；另外把一批四级教师提为三级；又把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能手和58年旧市区委镇压革命干部的打手，我校总支书记兼校长孙岩连提两级。

四，1959年底旧市委区委借党内整风反右倾，大搞“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我校党总支忠实执行了这一黑指示，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同志，保护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五，60年旧市委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年初发“跃进奖”，我校按业

务“好”“坏”和初高中任课界限，分三等发给。一等为40元，二等为30元，三等为25元。卞仲耘公开说，“人人皆大欢喜”。实际上，拿到三等的好多闹情绪，造成教师对立，高初中斤斤计较，同时也造成不少教师，在教学年级上只能上不能下的恶劣影响。甚至于旧区委抹杀阶级观点，在困难时期按工资数把三级以上教师折合成相当17级以上的干部，给予糖、豆、肉、蛋、香烟补助。

1961年——1962年

一，继续贯彻保命哲学

（一）继续贯彻“一切以热量为转移”的反动口号，反复强调干什么事儿都要考虑消耗热量的大小，搞得人心惶惶，要求班主任每天向卫生所报告本班学生浮肿情况，在教职工学生中大力提倡“自由化”，大砍政治活动，消磨群众的革命斗志。同时，在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候，我校在新年联欢会上大演“货郎与小姐”、“灰姑娘”、“吝啬人”、“李慧娘”等黄色戏剧，使资产阶级思想在我校大泛滥。我校领导孙岩、卞仲耘对这些腐蚀青年意志的东西却非常欣赏，称赞同学有艺术水平。

（二）借口劳逸结合，停办工厂，学生不再参加劳动。工厂变成追求利润的基地，只有几个老师和师傅在工厂干活，学校公开提出“为1万2千元利润而奋斗”！

（三）为了活命，校内大搞蘑菇、人造肉、小球藻等副食品生产，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仅生产蘑菇用的玻璃瓶一项就使国家浪费了几百元，而实际产量很少，并未使广大同学受益。

（四）困难时期，国家规定不搞基本建设，我校却违反政策，大走后门，购买建筑材料盖阅览室等。市场上最困难的时候，用走后门的手段要了公社萝卜、白菜四五万斤，还买有鸡鸭鹅等。

困难时期，广大师生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自己克服困难，节约布票粮票上交国家。

二，大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一）1962年9月，校领导传达贯彻《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50条），否定阶级斗争鼓吹“智育第一”，这是刘邓在普教战线上复辟资

本主义的黑纲领。校领导积极贯彻，大抓“双基”的方针，要求教师教研组班主任，制定抓“双基”的计划，定具体措施，实际上是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分数挂帅的那一套，那一套比“抓高三”更有迷惑性，它毒害了广大干部和教师，使他们继续为推行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效劳”。

(二) 1962年1月，团中央配合社会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抛出共青团在学校工作纲领38条，我校团委会在团员中传达讨论了38条，并在分支班主任工作中大力贯彻，影响极坏，大肆宣扬努力学习，学好知识等“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黑货，抹杀阶级斗争，不强调团员应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反而引导青年走白专道路。

(三) 1961年2月，党中央批转中央文教小组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安排的报告，指出“当前文教工作，必须贯彻八字方针”，“着重充实内容，大力提高质量，适当控制发展”。邓拓歪曲中央精神，提出“学校任何时候都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过程中每个环节发生的问题都要抓紧。”我校领导忠实执行这一黑指示，卞仲耘总强调在教学中着重抓紧“思想积极，行动稳妥”，并在学校计划中做了明文规定。卞也在讲话中经常宣扬全面恢复旧秩序、恢复旧制度、恢复使用旧课本等。

(四) 班主任、团工作中，组织学习陈某向校毕业生的讲话，辩论红专关系，大力宣扬政治落实于业务，猛抓学习，进一步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散布“三过”思想，甚至还荒谬地提出“红的标准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五) 1962年6月，陆定一的亲信童大林讲“中小学主要是掌握学习工具，有了工具才能去学知识，工具主要是语文、外语、数学，政治是学点知识。”我校积极推行这一黑指示，从考试、教学设备到复习、辅导，都要为工具课让路，领导也“深入”第一线，几乎每年都重点抓语文、外语、数学组的课堂教学。

(六) 1960年4月，陆定一抛出修正主义教育黑纲领：《教育必须改革》。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干着扼杀教育革命的勾当，提出“四个适当”的口号，赎买资产阶级“教学为主，智育第一”的黑货，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1961年，我校在师大领导下，按陆定一的黑纲领大抓5年制，推行修正主义的教改实验，片面强调6年功课5年学完，用浓缩的办法要求教师保证教学质量，只许比

12年制的质量提高，不许降低，严重造成学生负担过重，身体受到摧残。

(七)旧市委为了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的伟大号召，采取了对抗的措施。北京市成立函授电视大学，为没有考取大学和高中的同学补课，以备来年再考。以后，《前线》又发表社论，鼓吹自学是获取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我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有考上大学的，没有一个上山下乡的，未分配到社会工作的都上了函授大学。

(八)校领导不积极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反而多次组织学生学市教育局颁发的“中学生守则”，及我校制定的“学生学习常规”和“课堂教学常规”。在此二常规中，对学生作业、自习、考试、请假制度，做了较严格的规定，对教师备课、课堂教学、批改作业、自习辅导，也做了极严格的规定。这两个常规是恢复和巩固旧秩序，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毒草。

三，积极宣传“黑修养”，用“黑修养”腐蚀党员与群众。

(一)1962年8月，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复辟宣言“黑修养”再次出笼。旧区委如获至宝，企图用“黑修养”来改造党员，改造党。区委书记侯维城在布置工作时说：下半年党员教育以学习修养为主要内容，要求认真组织学习，各支部要做具体安排，还要求党内要严格过好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标准，仍是“黑修养”，从没有提过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改造思想，大讲党员在组织上要绝对服从，“企图使党员变成唯唯诺诺，胸无大志的驯服工具”，流毒极广！

(二)1961年3月以后，旧市委抛出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党的基本知识讲话》，这是在旧市委的《前线》发刊。这个修正主义的总纲领指导下，为了配合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向党进攻编写的。当时旧区委决定每个党员发一本，要求支部认真组织学习，给要求入党的教师也以此为党课的基本教材，散布修正主义建党纲领。

四，六二年平反问题

62年初，毛主席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时，曾提出“过去错误的处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或部分处理错了，都应当按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平反。”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等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大刮翻案风，说什么“过去几年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说什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了”。而旧市委除了忠实执行刘邓指示外，还提出了“不留尾巴”。我校党总支书孙岩为了树立个人威信，把一些应该甄别的同志不按组织手续甄别，不对全体党员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而一手包办，采取个别谈话方式进行。并执行刘少奇的黑指示，把不该甄别的也进行甄别，如吴秀，本人有一系列严重右倾思想，甄别后已把她调到40中学任副校长。■

（此资料由范世涛提供，高忆陵整理录入）

【资料】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期办于1960年11月的《劳动》小报，是当时开展教育方针学习活动以及学生在学工学农中改造思想的生动反映。

——编者

劳 动（第二期）

1960. 11. 30

一切社会财富，都必须经过人的体力劳动才能创造出来。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剥削阶级贱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我们要把体力劳动看作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我们要使全国人民，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摘自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的祝词

≈≈≈≈≈≈≈≈≈≈先生的话≈≈≈≈≈≈≈≈≈≈

一周的工业劳动时间是短促的,但如何通过劳动改造我们的思想,提高认识,培养自己成为党和教育方针所要求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我们劳动中重要的一环。

有的同学为了劳动而劳动,认为学校给安排了这个劳动时间,那我就来干,是完成任务来的,劳动中不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这样的同学在劳动中,愿意干技术性质的活,不愿作一般工序较简单的活,愿干锤锤打打不动脑筋的活,而不愿作那种要求胆大、心细、踏实、认真的工作。我们说这就是那种挑轻怕重、事事从个人兴趣出发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对头的,是不符合我们劳动的要求的,更不符合党的教育方针所要求的,应该立即改变。

经过教育方针的学习,同学们挖出了自己轻视体力劳动、重视脑力劳动的种种错误想法,认清了作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劳动的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是一条,白专道路,是行不通的。决心要时常以教育方针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认识了,更重要的是在实际行动中如何去贯彻,去改造。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人的思想是要不断改造的,就像每天必须洗脸、扫地一样,在劳动中要有意识的克服自己的缺点,虚心辩证地向工人同志学习,学习他们冲天的干劲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使我们真正成为合乎党的教育方针所要求的又红又专的劳动者! ■

※※※ 教育方针学习的收获、体会 ※※※

高一·三 文静

通过这次教育方针的学习,在思想上我得到了极大的收获。同时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有意识的挖许多错误思想的根源,发现其最根本问题,就是在于自己没有真正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如作劳动者的问题,我心里不愿意长期从事农业劳动,作一辈子农民。因此,平时也就认为劳动不需要那么多知识,觉得自己念了多年的书,从事农业劳动是不可能的。我愿意的是成为一个能劳动的知识分子

就行了。

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因为在我脑子里还存在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资产阶级思想，认为体力劳动是最简单的，而脑力劳动是复杂、伟大的，把劳动分成了等级。这种思想与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家庭影响有很大关系。同时，我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是要求每个人都有高度觉悟，高度文化，人人都是劳动者。到那时，三大类别完全消灭了，人人能文能武，当然就根本不存在能劳动的知识分子这类人了。人人都是共产主义劳动者，各人从事不同事业，只是根据社会建设分工不同。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求培养这种体脑完全结合的真正共产主义劳动者。而现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只是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方法，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消灭体脑差别。明白了这个问题使我认识到自己思想上还是把体脑分了家，与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这根本原因是因为我总觉得共产主义还远，还需要长期建设，而没有真正确立共产主义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的坚定信念，没有真正确立起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远大志向，因此没有把现在的学习、生活、劳动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联在一起，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将来。不愿做农民，不愿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是只看到现在的农村比较落后，比较贫困，这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而没有看到将来的农村，将是完全现代化的，变旧农村为新农村，是需要进行艰苦奋斗的，长期建设的。而我就没想到自己应该为这伟大的壮举贡献力量，作一个新型的农民，为农业劳动的机械化、电气化，为人民公社的更快发展贡献力量。

通过学习，使我对作一个什么样的劳动者才符合党的要求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今后的奋斗目标也更明确了。同时也深刻的体会到，现在党提出的人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方针是多么正确、英明。现在，参加农业生产，当一个新型的农民，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也是区别真正有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个标准。我一定听党的话，一旦党号召我去农村，我将欢欣鼓舞，踏踏实实地在农村干一辈子，成为一个新型的农民，向邢燕子学习。 ■

以前我一直认为：科学家也想到一心为革命，那他的贡献就比农民大，因为他一发明了一架机器，可以顶农民一锄头一锄头作多少时间的东西啊。而我总觉得我要为人民多贡献力量，所以我就应该去当科学家，而不应该去作农民。这种错误思想在辩论中受到批判，使我受教育很深。认识到一个人的贡献大小，不在于他作出产品多少，而在于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原来理解一个人就可以作一番大事业也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科学家决不能脱离劳动，他可以为劳动人民发明一个推动生产的新机器，但没有农民，他就活不成。所以这样看，是把个人看得太重要了，没有把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看作第一。另外把农民看得非常低，这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体力劳动。认为科学家“高一等”而自己作高一等的人，也就是要作比劳动人民高一等的人，这是什么阶级的思想，只贪图眼前的利益，不愿意作农民到农村去艰苦奋斗，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去发奋图强。这都是资产阶级的好逸恶劳剥削阶级思想，让你们都建设好了，我再去，让别人去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让别人消灭三差，让别人去建设共产主义，而我自己在旁边唱高调，这怎么叫革命青年呢？什么都顾自己，与教育方针要求的差的多么远啊。

我要作个革命者，作个能出色完成共产主义的突击手。 ■

听党的话作个劳动者

初三四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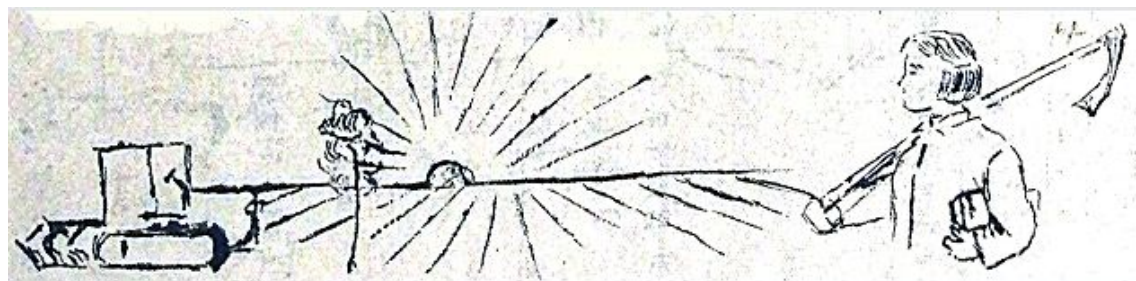
“劳动是光荣的，伟大的，我们要热爱劳动。”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之常言了。话是这样说了，但实际行动却不如此。

单说我们班吧，自从学校把打扫猪圈的任务交给我们班以后，我们一直没有重视起来。因此猪圈卫生很糟。我们班对工厂劳动和下乡劳动是非常热情的，但对养猪却有很多错误想法。有的同学嫌这工作太脏，有的同学说光打扫没意思，有的同学还说：“让动物小组去打扫吧，干吗还交给我们？”等等，以前我们班、队委会也没重视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思想工作，因此这些错误思想阻碍了我们的进步，使我们没有很好地完成学校交给我们的任务。

通过一周的教育方针的学习，我们班同学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尤其对劳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家认识到：要作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必须从现在起培养自己的劳动态度，树立真正的劳动观点。而我们以前对待清扫猪圈的态度都反映了我们看不起养猪工作和怕脏、怕累的错误思想，这和看不起农业害怕艰苦的思想是一样的，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这种错误的思想不彻底铲除，还能谈得上热爱劳动吗？艰苦奋斗是革命者的本色，作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得拣最重的担子来挑。同时我们也明确了养猪的重大意义。猪是六畜之首，它浑身都是宝，尤其对农业益处更大，猪能增加很多肥料，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猪皮、猪鬃都是轻工业的原料……

养猪就是支援农业的一个具体行动，学校领导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信任地交给了我们班，而过去我们辜负了学校的信任。我们向党保证：今后一定听党的话，出色地完成管理猪圈的任务，培养自己热爱劳动的思想。每个人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承担起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的任务。 ■

（上述署名文章的作者为化名——编者）



【编读往来】**1. 孙柏青、吴越谈王海光《答客问》，批评本刊有违首发之约**

贵刊一向要求首发，136期却让人大跌眼镜，王海光的《答客问》早在今年七月的《中华读书报》上就发表了，贵刊却仍旧刊发。这不是首发，而是转发。办刊的人都知道，转发人家的文章应该注明出处，而贵刊却不注明。仿佛还是自己首发。对此严重事故，贵刊如何处置？记忆的撰稿人拭目以待。■

孙柏青 8-1

王海光的《答客问》7月16日发在“共识网”上，17月发表在“爱思想”上，王文第一段说：“年初，我参加上海一个讨论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小型学术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一位搞网刊的朋友，对文章很感兴趣，索去登在了网刊上。”王文所说的一位搞网刊的朋友，显然是指办记忆的你们。可你们是7月31日才刊发王海光这篇文章的。时间上比“共识网”、“爱思想”晚了半个月。按王海光的说法，好像你们刊登在前，人家“共识网”和“爱思想”刊发在后。记忆曾经退过我的稿子，理由是在网上发过了，记忆要求首发。王海光这件事说明，记忆的首发的要求是因人而异的。记忆为什么关照王海光？■

吴越 8-2

2. 答孙柏青、吴越二位先生：

王海光先生的《答客问》是七月五日发给本刊的，此文是回答读者给《记忆》的来信，本刊发表《答客问》是职责所在。七月十三日王海光先生曾应本刊编辑之请，对文中的某个提法做了修改。可能他不知道本刊要求首发的规定，又将此文发给了《中华读书报》及“共识网”等。本刊不知道其文已在报刊及网上发表。所以未能依照规定撤下王文。谨此说明，并向读者道歉。■

《记忆编辑部》2015-8

3. (美)陈小穆谈王海光《答客问》

王海光《谈谈文革高层人物的研究》我已经读过，在《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5日第5版，标题一模一样，内容也基本一致。只是开头说一位搞网刊的朋友，对他的文章感兴趣，索去登在网刊上。王海光这篇文章可以从网上查到。我认为，这一作法十分欠妥。

另外，我觉得王海光文中把千秋文章和沈志华文章相比并不合适。因为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是2004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千秋文章大约写于2005年。而沈志华关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发表在《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上，相差七年，用后发表七年的文章指责千秋不该那么写林彪的抗美援朝，似乎不妥。而王海光回避了千秋文中的主要观点。贵刊是一位美国友人转给我的，希望以后每期发给我。 ■

4. 予庆谈江青研究

关于江青研究，《共识网》自2015年8月2日起连载戚本禹文《忆江青同志》，篇幅大，有4万字之多。戚从与江密切接触者、忠实追随者的角度对江做了回忆和记述。虽然戚的思维还停留在“继续革命”的框架内，但该文还是记述了不少史事，涉及许多人物，对流行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但也明显使人感到，又对江的行状多所掩盖。如该文中提到的“窃听器事件”等等，因缺乏资料难以稽考，令人真假莫辨。如《记忆》能约请相关亲历者、有识者从不同角度写出记述，探讨文章，则对于深入研究江青，有所裨益。 ■

5. (美)陈闯创谈第134期

董国强先生的大作太棒了，之前从未见过对军队派性如此详实的分析。该期第11页最后一段提到空29师以《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向上级打报告，其中收文单位除空六军、济南军区、空军党委和江苏省军管会，

还有一个“北京军区空军”被漏掉了。另外，注释中有两处错别字：第12页注释3的“有”应为“由”，第20页的注释6中“处张”应为“处长”。

沈迈克的口述很有趣味。第33页“1957年对六种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应该是“1957年对香花和毒草的六种标准”。第34页倒数第二段“宋江和孔老二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关系？把孔夫子和农民起义的头领方腊也拉出来，放在一起批”，这个“方腊”应该是“宋江”吧？第37页文章结尾提到1979年初沈迈克问来访的中方代表团彭真、杨尚昆能否复出，经查197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在报道1月27日的首都春节联欢晚会时，在标题中就特意突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十多年的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同志和王光美同志参加了晚会”，可见彭真的复出在1979年1月底就已公开了，而杨尚昆1979年1月份复出就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一职的消息尚且不知在何时被公开的。

至于安文江等人所写大字报《我们的决心》的成文时间明显是1966年7月13日，不知道为何第68页的注释1却特别说明该大字报时间当为1967年7月13日？注释是把年份弄错了。《我们的决心》一开头就提到“我们十一位同志听了中国人民大学七位同志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封人民大学的信应该就是从《人民日报》1966年7月12日《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写信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 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所公开的。所以安文江等人显然是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提前播发了这篇报道而心有戚戚，迅即写下大字报做出响应。另外从大字报的正文“我们是第一届完全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解放十七年。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十七年”也可以看出该大字报成文于1966年。■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